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 总
刊 第八期



2012.12



目 录

Contents

研究与探索

- 4 1946年邀请宋庆龄访英密档解析 郑培燕
- 10 从宋庆龄与克里普斯夫人的一次私人会谈谈起
王宁宁
- 15 分众化、品牌化、数字化
——关于青少年群体与爱国主义教育思考
傅 强

馆建工作

- 20 在“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
开幕式上的讲话 秦 量
- 21 在“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藏书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金晓春
- 23 我馆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工作综述 夏义坤
- 26 从纪念品分类漫谈研发方向 许毅捷

宣教论坛

- 28 弘扬红色文化 唱响红色旋律
——浅谈人物博物馆中的红色主题 傅 强
- 33 志愿者工作心得 秦琰 费佳

陈展天地

- 38 浅谈人物类纪念馆的陈列定位
——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例 董 卫
- 41 赴日办展疏记 宫洁菁

馆藏研究

- 45 宋庆龄收藏的边区票样 麦灵芝
- 49 几张珍贵的照片 一段难忘的记忆 郑培燕

文保之道

- 53 纪念馆藏品的保存环境刍议 徐建华
- 56 浅谈桂花的日常管理 徐世伟

藏书选译

- 59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连载） 宫洁菁

资讯快车

- 70 故居新闻

图版

本馆收藏的当代书画作品

1946 年邀请宋庆龄访英密档解析

撰文 / 郑培燕

近日笔者偶然查阅到英国外交部的一份与宋庆龄有关的秘密档案，内容涉及英国外交部就是否同意英国的一个非政治性组织——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宋庆龄访问英国这一提议所展开的讨论。笔者对这些档案进行了翻译和解读，对档案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初步探索。

两次邀请宋庆龄访问英国的提议

曾经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女性之一的宋庆龄，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可谓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典范。1946年初，英国杰出的女司法改革家马杰里·弗莱(Margery Fry)写信给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校长、英国大学女性联盟(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主席伊迪斯·巴索(Edith Clara Batho)，建议英国大学女性联盟(以下简称BFUW)率先邀请孙逸仙夫人宋庆龄访问英国。这一提议的理由是：孙夫人



▲ 伊迪斯·巴索

与她的妹妹蒋夫人一样，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最杰出的女性，而且是一位极其正直的女性。如果能够邀请到孙夫人，将是BFUW的荣幸。

尽管伊迪斯认为这是个极好的建议，但是，她也有一些顾虑，不知道向宋庆龄发出访英邀请是否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成立于1909年的BFUW，其组成人

员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宗旨是“促进不同国家妇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激发大学女性对市政和公共生活的兴趣”；“鼓励妇女独立的研究工作”等，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性组织。作为该联盟的主席，伊迪斯不希望联盟的任何活动牵涉到政治，或令本国政府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宋庆龄却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人物，即便是当时她与重庆政府没有关系，却依然与中国政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为了慎重起见，伊迪斯于1946年3月22日给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史班纳（J. C. Sterndale Bennett）写了一封密函，征求外交部的意见。

史班纳收到伊迪斯的信以后，经与外交部的其他官员开会讨论，一致认为如果宋庆龄接受邀请（尽管对此持怀疑态度），她将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发表演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此一来，无疑会让邀请她的机构以及中国政府难堪，从而中国政府会怀疑对宋庆龄的邀请背后是否还有什么政治动机。因此，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是：此举存在产生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而如果BFUW邀请一位政治上更“安全”的人选，例如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女士，则更为明智。

然而英国外交部并没有立即对伊迪斯做出答复，而是先给在重庆的英国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发了封密电，将外交部对此事的看法告知薛穆，同时也征求薛穆的意见。很快，薛穆在1946年3月29日给外交部的回电中表明了他

的观点：（1）他个人非常愿意看到宋庆龄被邀请访问英国；（2）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宋庆龄并非“绝对安全”，而吴贻芳则是合适的人选；（3）两位可能都不会接受邀请。

收到薛穆的答复，英国外交部方面于4月3日再次召集会议，就邀请宋庆龄还是转而邀请吴贻芳展开了讨论。

有官员认为，邀请宋庆龄访英不会令英国陷入尴尬局面，因为宋庆龄不是共产党，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元老”。中国政府迟早，甚至可能很快就会左倾。在这样的情况下，BFUW邀请宋庆龄访问英国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英国驻华大使虽然不认为宋庆龄会接受邀请，但这并不影响向她发出邀请。而吴贻芳也不是合适人选，其原因有二：其一她并不如宋庆龄那样富有盛名；其二是她去年从美国回中国途中曾经被邀请过，但由于疾病原因未能前来。事实上她刚回到中国，由于金陵女子大学从成都迁回南京，她可能一段时间之内都来不了。

也有官员认为，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应该留给伊迪斯和她领导的联盟。虽然宋庆龄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发表政治言论而令邀请方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如果该联盟愿意冒这个险的话，宋庆龄无疑是极佳的人选。如果不能邀请到宋庆龄，那吴贻芳也是不错的人选。

讨论出上述的结果，1946年4月8日，外交部远东司的官员斯科特（A. L.

Scott)代表史班纳给伊迪斯写了一封回信,将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以及外交部对此事的看法如实告诉了伊迪斯,由伊迪斯和BFUW委员会自己权衡后做决定。

显然,伊迪斯和BFUW委员会在反复思考之后,没有敢冒这个险,因为1946年10月,邀请宋庆龄访英的问题再次被提交到了英国外交部。

1946年10月,英国联合援华会的主席克里普斯夫人(Lady Cripps)和该组织的秘书长伊丽莎白·米勒夫人(Mrs. Elizabeth Miller)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即将访问中国。9月25日,在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King's China Institute)为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克里普斯夫人再次向外交部官员斯科特提出了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宋庆龄访问英国的提议。斯科特建议克里普斯夫人应该先向英国驻南京的大使通报一下。克里普斯夫人则坚持该问题在她离开英国前作出决定,并称如果必要的话,她将直接去找英国外相贝文(E. Bevin)。斯科特承诺将该问题提交给外交部,并于10月4日克里普斯夫人离开英国前告诉她结果。

斯科特在给外交部的汇报中认为,邀请宋庆龄访英的提议背后无疑有政治动机,意在鼓动英国的政治舆论去反对中国政府。此外,如果宋庆龄来到英国,她很可能会发表言论,批评国民党和中国政府,正如她在中国的一贯所为。这就可能使得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陷入尴尬的境地。尽管如此,宋庆龄能否去国外访问,中国政府说了算。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宋庆龄访英,则不应该将产生的任何结果归咎于英国方面。如何将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得更好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综合上面的考虑,斯科特认为,英国外交部应该告诉克里普斯夫人的是:尽管向宋庆龄发出访英邀请存在使英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可能性,但是英国外交部也不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也会将这一意见通知到英国驻华大使。

外交部的官员们就此再次展开讨论。有官员认为,在英国有很多人认为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无疑是个更好的赌注,是一个与英国以及美国人都希望看到的中立自由集团非常不一样的事物。如果宋庆龄来到英国并发表谴责国民党的演讲,无疑会让英国政府尴尬,也会鼓励无知民众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发表意见。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会想到宋庆龄在这方面的号召力,因而也不会同意她的英国之行。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1)宋庆龄不接受邀请。

(2)中国政府不同意宋庆龄访英。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外交部达成一致意见,采纳了斯科特的建议。英国外相贝文也同意这一决定。

之后,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克里普斯夫人:外交部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宋庆龄访英,是否发出邀请依然由英国大学女性联盟来决定。关于此事的利弊已经

在4月8日致BFUW主席伊迪斯的信中予以说明。克里普斯夫人对英国外交部的决定表示理解，也表示同意。

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折射出的 英国对华政策

英国外交部就邀请宋庆龄访英问题，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是由当时英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对华政策决定的。英国这样的对华政策，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中国的和平与统一，而是为了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

二战期间，英国的在华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因而二战后期，英国开始考虑恢复其在华利益，认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国才是最符合英国长远利益的。而中国战后局势能否稳定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冲突不断。为了实现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英国政府也试图调解国共冲突。但是当时的英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减弱，已经没有实力再对中国政府施加有效的影响，其在中国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也已被美国所取代，英国驻华大使对调解国共关系也不抱乐观态度。此外，中国和美国都不欢迎英国的参与，万般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奉行“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避免做出可能危害英国同国共任何一方关系的决定或行动。因而，1945年11月28日，英国外相贝文在下院回答英国政府对中国国共冲突采取何种“积极步

骤”时指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1]

在这样的前提下，邀请宋庆龄访英的提议第一次被提交到英国外交部征询意见时，外交部将决定权留给伊迪斯和英国大学女性联盟就不难理解。

而当邀请宋庆龄访英的提议第二次被提交到英国外交部时，中国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国共两党冲突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英国在华利益的命运。在英国政府看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但英国政府对共产党也不是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共产党依靠的是以农民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英国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容共”，反对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然而，英国又担心苏联会通过支持共产党，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使英国利益受到损害。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为了保证英国在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英国政府希望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意见，并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国共的调停，在中国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所以，此时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依然持“不干涉”的政策，对国民党充当旁观的亲善者，对共产党保持接触和抱以有限同情。因此，尽管认为宋庆龄访英存在发表政治观点的可能性，但并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交给中国政府来决定，因为他们知道在当前局势下，国民党政府不会同意宋庆龄的英国之行。

克拉克夫人据信是宋庆龄访英的 积极倡导者

在英国外交部官员斯科特看来，当时在中国运动委员会工作的塞尔温·克拉克夫人（Mrs. Selwyn Clarke）是邀请宋庆龄访英这一提议的主要倡导者。

克拉克是曾任香港医务总监的司徒永觉（原名泼西·塞尔温·克拉克）的夫人，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秘书。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克拉克夫人任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为保盟做了许多具体和有益的工作。宋庆龄曾赞誉她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战后克拉克夫人回到英国，在中国运动委员会工作，继续对战后中国进行帮助，她对中国人民事业的热情以及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做出的贡献曾得到周恩来的赞誉。

1946年2月18日，她写信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有意邀请宋庆龄赴英访问。周恩来3月9日复信说：“孙夫人仍在上海。据我了解，她的工作非常忙，你自己能想象到，随着中国和平的恢复，救济工作量成倍地增长。因此，我可否建议你再给她去信索要所有关于救济方面的资料。关于邀请孙夫人去访问你们的问题，希望你直接向她提出，因为我对她目前的情况不太了解，虽然我深信这种访问对于中国的救济工作极为有利。”

从英国外交部的资料来看，克拉克

夫人本人在1946年10月以前应该没有向宋庆龄提出邀请，因为克里普斯夫人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向外交部的官员透露，曾经有人邀请她亲自向宋庆龄本人发出访英邀请。当时外交部的官员也认为，提议克里普斯夫人邀请宋庆龄访英的是亲共的塞尔温·克拉克夫人。由此可见，克拉克夫人为促成宋庆龄访问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是这一提议的积极倡导者。

克里普斯夫人访华期间 向宋庆龄发出访英邀请的可能性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能确定BFUW最终是通过何人、以何种形式向宋庆龄发出的邀请，笔者推测可能是克里普斯夫人访问中国期间向宋庆龄提出的。

1946年时的宋庆龄，在中国主要是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救济及福利工作，支持战后的进步文化活动，救济孤儿及支持解放区。宋庆龄积极向海外募集援华物资，与英国联合援华会有密切的联系。1946年10月8日，英国联合援华会主席克里普斯夫人到达中国，展开对中国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克里普斯夫人此次访华的目的是考察英国联合援华会的捐款在中国的用途，以便作为将来展开援华工作的参考。

克里普斯夫人非常期待在中国与宋庆龄见面，来华以后，她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并给宋庆龄发了电报，希望能在北京与宋庆龄单独会见。但是宋

庆龄希望会见在上海进行，11月13日致信克里斯斯夫人，邀请她11月17日到家中用午餐。

纵观克里斯斯夫人在上海一周期间的活动，行程安排很紧，她与宋庆龄共同出现的场合均是出席一些正式的活动，例如11月14日，克里斯斯夫人一行乘飞机抵达上海江湾机场，宋庆龄与上海市长吴国祯夫妇、外交部主任陈国廉、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等到机场欢迎。18日下午，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举行鸡尾酒会，欢迎克里斯斯夫人，宋庆龄出席了宴会。这些正式的活动，都有相关的新闻报道，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克里斯斯夫人向宋庆龄发出访英邀请的内容。报纸唯一没有报道的是她17日的活动安排。也就是在17日，她应宋庆龄的邀请到家中共进午餐，这是克里斯斯夫人在沪期间乃至在华期间与宋庆龄的唯一一次单独的会见。因而，笔者推测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克里斯斯夫人向宋庆龄转达了BFUW邀请她访问英国的意思。

做出上述推测的另一个理由是克里斯斯夫人访华以后，克拉克夫人向宋庆龄的好友、原保卫中国同盟香港时期的司库邓文钊谈及了克里斯斯夫人关于宋庆龄的几句闲话，说克里斯斯夫人在中国期间对宋庆龄的一些做法感到不理解 and 诧异，包括不与她一同访问延安，不接受她的邀请外出用餐，不同她讨论政治，以及不接受BFUW的访英邀请等。这

也从侧面佐证了克拉克夫人和克里斯斯夫人与邀请宋庆龄访问英国之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非常有可能是克里斯斯夫人向宋庆龄提出了访问英国的邀请。

宋庆龄为何未接受访英邀请

虽然目前没有最直接的资料证明是克里斯斯夫人向宋庆龄转达了BFUW的邀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宋庆龄没有接受邀请。从目前所见的宋庆龄生平资料来看，没有宋庆龄在该时期访问英国的记录。其实，宋庆龄不接受访英邀请是英国外交部意料之中的事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宋庆龄这样做有她的立场和考虑。

其一，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很多地区都在遭受饥荒的威胁，传染病肆虐，中国的救济工作需要她，而且任务非常艰巨。因而自1945年底回到上海以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进行大量的社会救济工作，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利用对外宣传，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的民众争取援助，通过各种渠道，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向解放区运送了大量的医药物资和医疗器材设备。这个时候，宋庆龄认为她不能离开她在国内的工作。

其二，宋庆龄总是将她所从事的救济工作与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46年，内战的乌云笼罩（下转40页）

从宋庆龄与克里普斯夫人的一次私人会面谈起

撰文 / 王宁宁

伊泽贝尔·克里普斯，是英国知名的海外援助的组织者，著名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访问印度、中国、苏联及美国，回到英国后，在其日记中记下了当时中国哀鸿遍野的场景，克里普斯夫人读过后，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42年6月，英国政府决议成立英国援华会。克里普斯夫人担任了这一组织的主席，米勒夫人被选为组织的秘书长。

1946年10月，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率英国援华会代表团应中国政府之邀访华。在这次延续将近两个月、横跨3万英里的旅程中，她们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视察了战争期间他们援建中国的项目。

抗战期间宋庆龄与克里普斯夫人领导的英国援华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因而在克里普斯夫人决定访华后，二人对会面一事都有期待。在英国援华会驻沪

主任迈克尔·哈礼士1946年9月24日给宋庆龄的信中提到，“你曾说在克里普斯夫人大约抵达香港的时候，你可能会南下去那里。现在你还这么想么？”这说明宋庆龄曾有去香港与克里普斯夫人会面的念头，但最终并没有成行。

在原来的计划中，克里普斯夫人应在1946年9月29日从英国动身前往中国。宋庆龄原本想让克里普斯夫人出席1946年10月7日在上海逸园举行的第一届儿童福利舞会，在这届福利舞会的筹备方案中，克里普斯夫人是作为发起人被邀请的。笔者推测，宋庆龄之所以有去香港与克里普斯夫人见面的想法，就是想让克里普斯夫人来上海参加此次活动。但由于克里普斯夫人的行程几经变更，出发时间最终被拖延到10月5日。最终没有赶得及来上海参加这一当时十分盛大的慈善活动。

1946年10月8日，克里普斯夫人一行抵达香港，9日在代理欧洲司长叶公超

的陪同下抵达南京。在她抵达后不久，便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1946年10月12日，克里普斯夫人在南京给宋庆龄发了一封电报：

非常感激你的祝贺。在此送上我友好的讯息。我盼望着在我的旅途中能与你相见。得知你没收到我从伦敦寄出的信，希望几天内再给你写信。

从这封电报我们可以得知在克里普斯夫人来华前后，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联系，两人都期待着在这次旅程中相见。

在南京，克里普斯夫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笔者拙文《浅谈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中对此有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她还会见了中共代表团董必武、王炳南，会谈中她谈及希望参观孙夫人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资助的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和设立的孤儿院。在后来的行程中，她确实参观了延安、山丹培黎学校等地。此次参观很大程度上，克里普斯夫人只是去视察当时英国援华会所援助的救济项目，在她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中，只是坚持强调“此次如果不来延安，对于我的旅行是不圆满的”，对政治倾向三缄其口。

在此次访问中。克里普斯夫人对与宋庆龄会面一事非常期待，但这一会面又一波三折。这从另一份电报中可以得知。1946年10月23日，她从成都又发给宋庆龄一份电报：

得知你不能在北平与我见面，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准备从兰州到延安去。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在启程前带上你的代表。如果你能仍然考虑在北京会面的可能性，我将非常感谢你。私人的会见还是安静些好，上海的安排都非常正式和紧促，所以请你回复给我的朋友郑州华北医院的山姆。

伊莎贝尔·克里普斯

克里普斯夫人非常希望在北京就见到宋庆龄，这是因为北京的日程较为宽松，有时间可以进行一些安静的私人会面。上海因为一些官方的接待和参观事宜，安排的较为紧张。但即便是克里普斯夫人两次到达北平，都没能如愿以偿地见到宋庆龄。

哈礼士也曾就去北平会面一事的可能性询问过宋庆龄，并说如有可能可以为其安排行程。但众所周知，孙中山是在北京逝世的，那里对宋庆龄来说是一个伤心地。对于会面一事，宋庆龄仍然希望在上海进行。11月13日，宋庆龄给克里普斯夫人写信，邀请其来参加11月17日中午的家宴。

亲爱的克里普斯女士：

欢迎你来上海！

经过连续的失望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见面和相互了解的机会，我对此盼望已久，很遗憾至今才得以实现。

你这次访问一定有着丰富的经历，我希望你已经见到了你想见的一切，并且参观了那些对你的工作至关重要的地方，短暂的旅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你可以获得真实的印象——英国援华

会的捐助在这里是如何被使用的。

我将高兴地听取这次旅行的所有情况。如果你能在星期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时三十分来我家用午餐，我们将能就此长谈并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希望你能在百忙中拨冗光临。

祝好

你诚挚的宋庆龄

11月14日，克里普斯夫人一行乘建国号飞机抵达上海，飞机降落在江湾机场。为了表示对这位贵客的尊重，宋庆龄亲往机场欢迎。吴国祯市长夫妇、外交部陈国廉主任、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等三十余人均到机场欢迎。克里普斯夫人身着淡咖啡绒毛外衣，黑色衣服，黑围巾，黑呢帽，缓缓走下飞机，与孙夫人及欢迎者握手问好。

克里普斯夫人访沪的行程是由是上海市政府和英国援华会上海办事处共同决定的。哈礼士曾将确定好的行程复件寄送给宋庆龄，便于她做出安排。在1948年米勒夫人撰写的《我们与克里普斯夫人一起去中国》提到了他们在上海的行程安排，足以感到这确实是一次忙碌的旅行。

“今天的计划包含早上10点的一个记者招待会，11点去英国援华会上海分院参观，下午4点到5点中外救济团体在美国社交会堂举行茶会招待，晚上8点参加在市长官邸举行的隆重公宴。

明天早上，克里普斯夫人赴江湾参观陆军医院，与林可胜将军共进午餐。

下午4点半上海妇女团体在西爱咸斯路75号以茶会招待克里普斯夫人，晚上6点至8点，出席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举办的鸡尾酒会。

周日，克里普斯夫人将会拜访孙夫人。周一早上参观漕河泾难童教养会，晚上参加了由中英文化协会和留英学生联合会举办的英国援华会主席克里普斯夫人欢迎会。”

从上面的行程我们可以看出，克里普斯夫人将在上海度过忙碌的一周。

那么11月17日星期日，克里普斯夫人是否应约于去了宋庆龄家用午餐，是我们最为好奇的。

报纸没有披露克里普斯夫人这天的安排。在1948年米勒夫人撰写的书中，提到了这次会面。

“克里普斯夫人与孙夫人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漫长和愉快的下午。孙夫人在引退之后，住在法租界一幢舒适的房子里，忙碌着她的救济工作。她为了看到她丈夫梦想实现而活着，她放弃了个人的所有酬劳，现在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在最需要她的地方仍可以感受到她的影响。”

从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宋庆龄与克里普斯夫人在11月17日周日这天确实进行了会面，两人应该交谈的非常融洽。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从重庆返抵上海后，由于莫利哀路寓所在日军占领期间损坏严重，无法居住，因而直接入住了国民政府拨给的靖江路（今桃江

路) 45号寓所, 1947年下半年由靖江路45号寓所重又搬回莫利哀路寓所居住。直至1949年春天搬至林森中路1803号寓所(今淮海中路1843号)居住。因此笔者推断宋庆龄与克里普斯夫人会面进餐的地方就是靖江路45号寓所。

在馆藏书信中, 有一封1946年12月2日耿丽淑致宋庆龄的信中提到, “克里普斯夫人周日到你家拜访时我能有幸坐陪, 使我难忘并深深感激。非常感谢你能邀请我。”信中所提到的这次会面就是11月17日克里普斯夫人来拜访时的事情。这一简短的叙述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克里普斯夫人接受了宋庆龄的邀约。宋庆龄应该还邀请了一些朋友坐陪, 其中就包括耿丽淑。这次会面都谈了些什么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史料揭示, 但二人的分歧可以从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与宋庆龄的通信中窥见一斑。克拉克是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她回到英国, 在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工作, 继续对战后中国进行帮助。1946年前后, 她与克里普斯夫人有些接触, 并把她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宋庆龄, 这给我们进一步了解克里普斯夫人当时援华的态度提供了参考。

在克里普斯夫人访问中国之前, 克拉克曾与之见面, 并请她到国际和平医院去。对英国援华会这一组织克拉克在1946年8月12日的信中宋庆龄道出了自己的直接印象: “我觉得英国援华委员会的成员, 使人相当伤心。委员会中都

是退休的传教士, 克里普斯夫人到场时, 也只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我提出中国的许多慈善救济的计划应得到资助时, 我总是被告知伦敦方面没有这样的指令, 中国的委员会只有分配资金的权利。我曾作过统计, 大约有9/11的援助是给教会或是国民党方面的。秘书长米勒夫人是个无党派人士, 她是个很好的组织者, 或许从事任何商业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会很出色。办公地点设在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租借费和职员工资都很高。克里普斯夫人是个很正直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反共人士。她更多的是从基督徒而不是从政治原则出发。”短短的几句话勾勒出了英国援华会当时的大致情况。克拉克的这一意见非常紧要, 很快哈礼士便做出了解释。1946年9月24日他在致宋庆龄的信中表示“克里普斯夫人当然不是共产党, 但却非常左倾。”希望避免在还未见面就产生分歧。

不知何故, 克拉克对援华会的印象有所反复。克里普斯夫人回国后, 克拉克又曾与她接触, 对克里普斯夫人的印象大为改观, 乐观地透露出英国援华会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调整。1947年2月10日她在信中谈到: “作为克里普斯夫人的访问成果, 也由于她对中国的政策和救济问题非常熟悉, 当她谈到新政策时, 英国援华会准备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我希望由于她对目前局势的理解会产生更多的有建设性的方案。”但是这种美

好的愿望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时间推进，英国援华会的调整并没有照她的预期进行。1947年6月4日克拉克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尽管克里普斯夫人本人很诚恳，但英国援华会的政策仍没有改变。大量的钱款仍旧是到国民党统治的传教机构去了。因为她的机构成员几乎完全是教会性质的。她本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同英国援华会交涉。我看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克拉克的这一反馈对宋庆龄影响很大，也让她渐渐明白援助的困难。因而在后期的通信中，我们看到宋庆龄在向英国援华会要求援助时，都只是谈到了儿童救济的困难。

所有这些材料说明，即使在抗战时期，英国援华会出于援助的目的，给予共产党区域一些援助，但是克里普斯夫人本人无法决定具有浓郁教会性质的援华会援助的方向，加之访华后，她对中国形势及国共双方有了自己的判断，援助的力度和方向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即便如此，宋庆龄仍没有放弃向他们争取更多援助。这可能与周恩来对宋庆龄建议有关。1946年12月17日，周恩来致函宋庆龄，阐明现在美国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的重要性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

在1946年11月18日下午中英文化协会和留英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欢迎克里

普斯夫人宴会上，宋庆龄和吴国祯市长夫妇均有参加。11月30日，克里普斯夫人离港返英，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香港，她拜访了一个私人且不甚著名的孤儿院，但却只给共产党的游击队5分钟的面谈时间，邓文钊在1947年2月15日给宋庆龄的信中提到了这点，并进而怀疑“克里普斯夫人并不是民主中国的真朋友”。

受英国政治立场的影响，克里普斯夫人与宋庆龄的交往也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但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普斯夫人领导的英国援华会在抗战期间给予中国的大量援助，成为英国人民同情中国、支持中国的一种姿态、一种立场。除了资金援助，更为可贵的是英国援华会所做的文化工作。通过组织中国艺术品的展览，中国问题的宣传，音乐会，联欢会，对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该会在伦敦还出版了季刊，名为《明日之中国》，为我国的国际宣传出了不少力。

尽管受到英国援华会冷淡的对待，宋庆龄仍孜孜不倦地争取援助。在1948年她仍多次写信给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阐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期待他们为解放区的儿童多方援助，并盼望他们为筹款给予配合，可惜，目前没有更多的材料证实英国援华会有何反馈，但宋庆龄为中国解放事业付出的不懈努力仍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分众化、品牌化、数字化

——关于青少年群体与爱国主义教育思考

撰文 / 傅强

爱国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内核，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教育是对青少年的最基本教育，是一项具有普遍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教育。作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历来重视对青少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力求将本馆打造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培养爱国情感、陶冶道德情操的理想场所。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模式和新方法，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故居特色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分众化、品牌化、数字化三个方向上进行了思考和尝试。

一、分众化

分众化的概念来自于媒体行业，而我们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即是指根据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将青少年群体按照不同年龄段、学段划分，打造适合他们自身特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我馆工作人员在长期实践中潜心研究、深入总结，发现不同年龄段、学段的青少年，其思维方式、情绪情感、注意力、感知能力、接受能力、兴趣点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同样一个活动，可能小学生非常喜欢，但初中生会觉得幼稚，同样一个讲座，给高中生讲效果很好，但是给初中生讲可能他们就没法接受、理解。所以我馆在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特别针对不同年龄段、学段的特点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适合特定群体的主题教育活动。

例如“为故居增色 为梦想添彩”少



▲ “为故居增色 为梦想添彩”活动

儿填图活动是故居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低年级）阶段的一项主题活动。这个阶段的孩子想象力十分丰富，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感知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我们认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要看懂、理解我们的基本陈列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一方面尽量在讲解中多加入一些故事，让孩子们对宋庆龄有一定的感性了解，另一方面我们设计了这个少儿填图活动。活动选取了故居最具代表性的主楼建筑、香樟树和鸽子作为素材，制作成具有故居特色的填图卡。孩子们在参观结束后，可以来到设在临时展厅的画桌前，选择自己喜爱的图样，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涂上颜色或创作图画。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同时加深他们的参观印象，让参观的过程成为一次有趣的体验。前来参观的老师和家长们也表示，这样的填色活动，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单纯的参观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故居寻宝之旅”活动是故居近年来打造的适合小学生（高年级）及初中阶段青少年的一项特色活动。每到节假日，会有很多家长带着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到故居参观，家长往往很感兴趣，希望孩子也能接受教育，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信息的识别和分析能力还很有限，常常不知道该看些什么，在陈列中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和关注点，也很难有所收获。而“故居寻宝之旅”则为孩

子们量身定做了一条参观路线，让孩子们按图索骥，主动在展厅中寻找一些造型别致或者是有着特别意义的文物，然后用答题的形式完成整个参观过程，最后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领奖的环节来激励孩子。这样活动就是把原本被动的“参观”变成了主动的“寻宝”，此时不再是家长拖着孩子要他看这个看那个，而是孩子拖着家长一起寻找寻宝图上的文物，通过活动，我们实现了激发孩子们的参观兴趣的目的，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充分了解伟大女性宋庆龄的相关事迹，无形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这项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也得到了前来故居检查暑期未成年人工作的市教委、市文明办和“校外联”领导的赞赏。

“樟叶寄思念 伟人在心间”活动是故居针对高中阶段青少年开展的一项活动。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思想逐渐成熟，除了被动地接受知识之外，他们更愿意在社会实践中体现自身价值，也希望



▲ “樟叶寄思念 伟人在心间”活动

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故居在每年的4、5月樟树落叶期间，就会邀请一些高中生来到故居，一方面通过参观了解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和光辉一生，另一方面请他们动手清扫宋庆龄故居庭院内的樟树落叶，让他们用自己付出的劳动来表达对伟人的缅怀。今年，我们又加入了制作樟叶纪念卡的活动环节，让这些同学在劳动之后，再用宋庆龄故居的樟叶亲手制作一张独一无二的纪念卡，我们还鼓励他们在纪念卡上写下自己的感悟。这样的活动不仅使同学们在参观中对宋庆龄有所认识，也让他们通过劳动树立起环境保护和集体合作意识，更让他们在了解、学习宋庆龄的高尚品格的同时得以抒发内心感受，实现我们的教育目的。

分众化还体现在我们的讲解词和宣讲稿。为了实现更好的讲解效果，我们特别根据不同年龄段、学段的青少年的特点和参观需求重新修订了讲解词，分为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四个版本，进一步使故居的讲解更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我们的宣讲稿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确定主题，例如针对小学阶段的《宋奶奶的故事》、针对初中阶段的《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及针对高中阶段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等系列主题宣讲，都受到了各个学校的欢迎。

二、品牌化

近年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先

后提出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打造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品牌活动，市委宣传部更是将“爱国主义教育品牌活动”纳入了每年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评估考核中。而早在2005年，我馆就已成功开展了一项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宋庆龄班”。

2005年至今，我馆先后与周边的南洋模范中学、市二中学、市三女中、华东模范中学等14所中学一起，结合学校德育教育，共同开展了创建“宋庆龄班”活动。在学校创建伟人班，进行命名和交接，每年开展相关的纪念、公益活动，这不仅是对同学的激励，更是直接把伟人精神送到学校、送到班级，将我馆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自“宋庆龄班”创建以来，故居不仅成为了“宋庆龄班”及其所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课外场所，也是各个学校之间友好往来、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华东模范中学、市三女中、南洋模范中学等学校多次在故居



▲ 2011年“宋庆龄班”主题情景剧展演活动

举行成人仪式、毕业典礼、德育教育等活动。而我们除了安排讲解员担任“宋庆龄班”的辅导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宣讲、讲座、主题班会等各项宣传活动外，每年还会结合社会热点和馆藏资源，策划一到两个大型主题活动，邀请“宋庆龄班”的同学参加，使同学们在这个第二课堂里接受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自2007年起，为弘扬伟人精神，我馆先后开展了“宋庆龄班——环保节约、奉献爱心”公益活动（2007年）、“追寻宋庆龄的美德”中学生有奖征文竞赛（2009年）、纪念宋庆龄逝世三十周年主题情景剧展演活动（2011年）、“寻访宋庆龄在上海的足迹”暑期摄影活动（2012年）等大型主题活动，得到了各校负责人及“宋庆龄班”师生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除了这些大型活动，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都会从“宋庆龄班”中选拔一些同学来到故居担任志愿者，这也成为了“宋庆龄班”的常规活动。经过严格的招募、培训和考核程序，脱颖而出的同学们满怀期望来到故居担任志愿者讲解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中、英文的讲解服务。从害怕到勇敢，从生疏到熟悉，从紧张到自如，同学们在短短两个月的讲解工作中获益良多。一方面，故居通过培育志愿者拓展了宣传阵地，扩大了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志愿者同学通过在故居的服务接受伟人思想的熏陶，锻炼了自身能力，与故居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

2010年，我们在开展各项活动的同时，还精心设计了一套针对“宋庆龄班”同学的调查问卷，通过调查分析，深入了解了学生们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并在调研基础上推出了新版《宋庆龄班活动计划书》，规范了每一届宋庆龄班的基本活动流程和具体操作形式，将“宋庆龄班”的各项工作纳入到一个有计划、有目的、可操作、可评估的规范体系中。通过“班旗”交接、主题宣讲、主题班会、主题实践和总结表彰等各类活动，实现仪式教育、主题教育、班会教育、实践教育和成果教育。这为下一步开展和完善“宋庆龄班”主题活动，设计适合广大青少年学生特点、内容有益、形式生动的活动项目，让创建“宋庆龄班”真正成为辅助学校开展德育教育的品牌项目，提供了重要参考。

现在，“宋庆龄班”已经成为我馆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的品牌项目，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精神文明办的肯定和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各所中学的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中学加入到“宋庆龄班”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同学以进“宋庆龄班”为荣，以来故居服务为荣。那些从“宋庆龄班”走出来的同学们，都与故居及故居的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表示将来只要有机会，还要到故居来服务，而且还要介绍身边的朋友、同学也

一起来——他们被我们称为宋庆龄精神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觉得，通过“宋庆龄班”的活动，在这些同学们的心中播下了一粒宋庆龄精神的种子，它将伴着这些同学一路成长，让他们在未来前行的道路上得以汲取精神力量。而这，正是我们的开展“宋庆龄班”活动的目的。

三、数字化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这也成为了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新课题。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媒体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博物馆事业，尤其是从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角度来说，新媒体是对现有的教育形式和手段的有益补充。结合我馆的实际，在目前阶段，尝试利用场馆内的多媒体设施和互联网拓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都比较具有操作性。

作为陈列展示的补充，我馆在展厅内放置了两个多媒体触摸屏，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青少年对展柜中的展品的兴趣远不如他们对触摸屏的兴趣来得大。相对于静态的陈列，他们更喜欢通过点击和互动来获取信息。如果我们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和兴趣，选取部分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物、展品或场景制作成趣味游戏，利用多媒体触摸屏与青少年进行互动，通过答题、拼图或是场景还原这样一些生动形象、寓教于乐的方式激发青少年对历史的好奇心及参观兴趣，必然

会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信息。为了方便广大青少年了解宋庆龄、了解故居，我馆在进行网站改版时，也可以尝试在网站中将上述的多媒体趣味游戏进行整合，制作一系列适合青少年的互动游戏。以“网上游览”为例，我们可以以寻找故居内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文物为主线，让青少年点击进入故居，按顺序参观每个房间。同时我们设置一些小“关卡”，每个关卡都由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小游戏组成（例如让青少年在规定时间内把打乱顺序的图片拼为完整的场景），只有完成了这些小游戏才能进入下个房间，形成环环相扣的游戏模式。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在网上参观故居，同时让参观的过程富有乐趣、有所收获。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说，既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科学地揭示其中的全部含义，更要在实践上不断探索，找到正确的途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其历史的具体的内容，也需要有恰当的载体和方式才能真正得以传承。不断探索、深入思考，找到真正适合青少年群体的、真正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将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秦量副主任在“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长沙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今天开幕了。我谨代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各位领导、来宾对本次展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宋庆龄这个光辉的名字，是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她的高风亮节，光前耀后，堪称世代楷模。她具有超人的智慧、高尚的情操、刚强的意志、不屈的毅力。她出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她运用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她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

和正义人民的仰慕和崇敬，被世人公认为“国之瑰宝”、“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以宋庆龄生平活动为线索，主要介绍了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开始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展览共分为八大版块，通过二百余幅历史照片和近五十件珍贵的文物、文献真实再现了宋庆龄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光辉事迹和她勇敢无畏、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举办此次展览有着特殊的意义。刘少奇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早在20年代的大革命运动中，宋庆龄就曾对刘少奇领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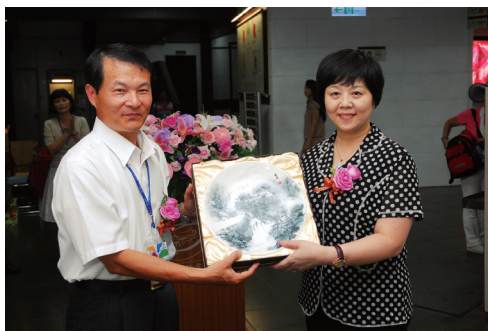
（下转 22 页）

金晓春馆长在“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开幕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福林馆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我馆主办的“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在这里举行开幕仪式。首先，我谨代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向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各位来宾、向大力支持帮助办展的国父纪念馆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在我们两馆的共同努力下，此次展览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 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王福林馆长向金晓春馆长赠送纪念品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著名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世界和平事业的捍卫者。她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事业，1915年与中山先生结婚后，作为中山先生忠实的助手、伴侣和战友，并肩走过了十年征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宋庆龄以继承和捍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原则为己任，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志不断努力。她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崇敬，被国人誉为“国之瑰宝”，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女性之一。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是她一生中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地方。那里不仅是宋庆龄的家，也是她处理政务、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故居珍藏着孙中山、宋庆龄的重要文物、文献一万余件。近年来，我们还收藏了许多来自社会各界以缅怀宋庆龄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此次展出的正是其中的一部分佳作。这些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爱好

者们或直抒胸臆，或寄情山水花鸟，用自己的笔墨表达对宋庆龄这位世纪伟人的敬仰之情。上海的著名书法家刘小晴先生还专为此次展览创作了以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一文为蓝本的书法字帖。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中华文化却不曾中断，一脉相传，始终维系着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统一，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国书画蕴涵着深深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

（上接 20 页）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道义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建国后，在长期的共同工作和日常交往中，宋庆龄与刘少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对宋庆龄有着极高的评价，他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直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宋庆龄也非常敬重和信赖刘少奇，1957年4月，就是在上海的寓所，宋庆龄正式向刘少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不仅如此，宋庆龄还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孩子们有着密切交往。宋庆龄与刘少奇全家之间的崇高情谊，在“文革”这场大灾难

我们在这里举办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画展，既是对民族先贤的缅怀和纪念，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之魂。

我相信，此次书画展的成功举办，对于进一步扩大沪台两地文化交流，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亲情、友情和乡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谢谢大家！



*2012年9月4日至11日我馆在台北孙中山先生纪念馆（即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了“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

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为世人所赞誉和传颂。这次展览，既是对宋庆龄生平活动的宣传，更是对刘少奇和宋庆龄之间真挚友谊的展示。

最后，再次感谢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沙市委宣传部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领导和各位同仁对本次展览的支持和帮助。预祝展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2年8月28日至11月21日我馆在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举办了“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秦量为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我馆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工作综述

撰文 / 夏义坤

2012年8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经上海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初评和推荐，由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被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功获得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与纪念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分不开的，也是纪念馆历代领导与全体员工携手共进，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参与徐汇区国家旅游标准化城市创建和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过程中，全馆上下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查找不足、整改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美化了参观环境，完善了服务设施，有效提高了景区档次，给游客创设了一个更加安全、舒适、整洁、优美的参观环境。

一、资源优越，底蕴深厚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同志生前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是她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后处理政务、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收藏文物丰富，陈列展品精美，

有很多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历史的见证物，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这里不仅是人们了解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人们缅怀革命前辈、学习历史知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这里地处城市中心，交通十分便捷，周边服务设施齐全，其地域和资源优势突出，是人们学习和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上海宋庆龄故居有一幢保存完好，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历史文物建筑，四周香樟环抱，终年葱茏苍翠，是上海市区花园别墅的典型代表。经过多年的景区建设和整治，庭院环境优美，花草四季如春，景色宜人温馨，展览新颖精致，服务设施完备，对观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院内宋庆龄文物馆门前开辟有小型纪念广场，一尊高约2.3米的汉白玉宋庆龄雕像座落在广场中央，并配置有多媒体显示屏和音响，不仅为学校、企事业单位举行各种仪式提供了方便，也为

观众纪念和缅怀宋庆龄提供了极佳场所。

为了宣传宋庆龄的光辉事迹，满足社会及观众的需要，纪念馆在院内建造了宋庆龄文物馆，向观众展示了宋庆龄的光辉一生，展示内容丰富，展示手段先进，展示形式新颖，展示效果良好。为了积极配合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纪念馆开辟了一个小型临时展厅，适时推出各种专题性的临时展览，满足了不同观众需要，吸引了大批旅游参观者。如结合建党90周年举办《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文物图片展，结合“迎世博，树新风”活动举办《清菊雅石——宋庆龄的高尚品德》专题展等，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赢得各界肯定和好评。此外，纪念馆坚持公益性的办馆理念，每逢“宋庆龄的诞辰、逝世纪念日”、“中国旅游日”、“国际博物馆日”等，都要实行“鲜花代门票”等免费或优惠开放活动，也提高了馆的知名度，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上海宋庆龄故居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上海市红色旅游协调小组命名为“红色旅游基地”，并连续六届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明单位”。这些铭牌的取得，形成了叠加效应，为宋庆龄故居文物保护、对外宣传工作等提供了较系统的标准，为宋庆龄故居规范、有序、健康和持续发展

提供了保证。

二、坚持标准，积极争创

纪念馆于2010年底，结合徐汇区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试点，进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在创建过程中，全馆上下全力以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其他工作相结合，塑造旅游景区新形象，努力争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一是加强领导、全馆动员。纪念馆党政领导非常重视，成立了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和推进纪念馆的4A创建工作，统一指挥、查找问题，研究对策。纪念馆先后制定了创建工作方案和整改计划，召开馆创建工作动员大会和专题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落实创建方案和整改措施，形成全馆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良好局面，推动创建工作出成果、见成效。

二是加强整改，优化环境。纪念馆认真对照国家旅游标准化要求，加强景区的环境整治，先后更新了多语种参观指示牌、标识牌，更换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类的垃圾箱，在院内增设了参观导览图、参观线路警示标识，在游客服务中心增加了拐杖、轮椅车、多语种导览器、红十字医药箱、景区宣传资料，并在醒目位置向游客公布了讲解员公示牌、观众留言簿、意见簿、投诉电话，重新更换了纪念品价格标签，增植了花草，



▲ 故居获得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铭牌

布置了盆景，进一步改善了服务，美化了景区参观环境，为游客提供更周到、更方便、更舒适旅游参观服务。

三是开展了员工教育和培训。纪念馆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开展了“文明礼仪”、“讲解知识”、“双语讲解”等业务培训和考核，组织讲解员赴相关博物馆、纪念馆学习考察，开展各种应急演练等，以借鉴经验，增长见识，提升能力，提高素质。讲解人员还积极撰写针对不同观众的讲解词、宣讲稿，使得讲解内容更科学、更客观、更生动、更有针对性，提高了观众兴趣，增强了宣传效果。

四是加强了制度建设。在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过程中，纪念馆还认真修订馆文物保护、设备管理、环境绿化、票务和安全等一系列景区管理制度，完

善了参观服务流程以及大客流、突发事件、消防救护等方面的应急预案，使开展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完善了景区管理长效机制。

三、意义深远，成效显现

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顺应旅游业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推动旅游景区建设和促进旅游景区服务升级的重要载体。上海宋庆龄故居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对促进纪念馆旅游景区建设，规范景区服务与管理，提升窗口形象和服务质量，促进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全馆工作人员更加自觉地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标准来检验和衡量自己的工作，加强业务学习，做好参观环境的美化、净化工作，使得景区管理更加规范，工作流程井井有条，环境面貌整洁美观，设施设备运行良好，游客参观安全有序，一线接待讲解人员精神饱满、仪表端庄，对观众服务更加热情细心，导游讲解更加精练、准确，游客满意率不断上升，景区的品牌效应和文明形象日益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

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使我们认识到：人物类纪念馆不仅仅是一个文博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参与行业等级评定，有助于纪念馆景区建设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助于向行业看齐，找到差距，打造品牌，创新发展。

从纪念品分类漫谈研发方向

撰文 / 许毅捷

旅游纪念品，作为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被旅游者所接受和重视。随着“自由行”旅游的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纳，早些年被良莠不齐的旅行社所扭曲的旅游购物，正渐渐走向正轨。旅行者们带着期待的心情浏览着各色纪念品，或给自己留一份纪念，或给家人朋友捎一份手信，似乎这已经成为了旅行的一种习惯。正因为旅游纪念品这一市场需求的扩张，对纪念品研发的要求越来越严峻，必须要以更高的质量来维护来之不易的市场需求，更要以创新多样的设计理念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为此，笔者试从纪念品分类的角度，结合我馆现状，提出对于研发方向的一些想法，与大家分享讨论。

一、纵向分类：知识结构的由浅入深。

就我馆游客的组成来看，既有学校组织前来参观或是由家长带来参观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们的年龄不同、阅历不同、知识储备明

显不同，为配合这些不同，纪念品的知识结构也需要有所区别。比如针对学龄前儿童设计的纪念品，应配有鲜艳的色彩，大量的图片以及可以互动的样式，以直观的方式，“玩”的态度来研发纪念品；而针对专业研究人士，则需要一些深入的、专业领域的信息。当然，以上两种人群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笔者认为，从知识结构的角，纪念品可分为3个研发方向，一是针对专业人士的学术刊物，它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才能够接受；二是针对一般观众的普及型纪念品，它仅在观众原有认知上做一点点提升；三是针对知识层次比较低的孩童的认知型纪念品，它在专业上并没有太多的要求，更侧重于培养参观博物馆或是旅游景点兴趣的纪念品。

从我馆现有的纪念品来看，针对一般观众的纪念品是最为丰富的，包括画册、简介、明信片、文物仿制品等纪念品；针对学术爱好者的纪念品也有一些，包括文物图录、书信集、各类传记等；

但对于孩童的纪念品却比较匮乏，宋奶奶本就是最爱孩子的，我们希望能把这一份爱延续下去，再加上培养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的兴趣，也是我们博物馆人的社会责任。所以在纪念品的研发上，尽快弥补针对孩子的纪念品种类，笔者认为较快打破纪念品设计瓶颈的有效手段。

二、横向分类：单一纪念性到叠加实用性、趣味性。

当旅游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某某某到此一游”不再是炫耀的资本，于是，单纯纪念性的东西对于游客不再有太大的吸引力，与其买一个纯粹纪念的东西，不如拿手机留几张影像来得实惠。所以新研发的纪念品需要在满足纪念性的同时，叠加入实用性与趣味性，才能够真正符合市场的需要。

基于我馆现有的纪念品品种，像木狗笔筒和便携盒都是开发得比较成功的，能引起游客购买的兴趣，但最终是否购买，可能取决于售价或者其它一些原因，但能够有兴趣就是设计研发者的成功了。再看到现在市面上一些创意小店非常红火，也许店面并不大，里面售卖的商品也并不便宜，但是人头攒动，这就是市场对于创新的认可。所以，可以在同行之间相互学习的同时，关注潮流资讯，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方式去表达“纪念”二字，才是符合市场要求的。

三、价值分类：低成本派发品和保

值升值限量品。

在很多的展览、展示的场所，相比于其它场馆，我馆的展台总显得简单了些，总是那么几张单页。其实借鉴一下其它场馆，只是把单页改头换面，用另外一种形式呈现，比如把单页的内容印制成纸质的书签、卡贴、便签等，就得到了大家的青睐。若是有了此类的派发品不仅可以满足展览、展示的需要，同样在馆内做一些需要游客配合的活动时，也可以作为小礼品发放。因此，我馆应制作一些精美的派发品，以起到更好地宣传作用。

在我馆的纪念品仓库中，还有一些价值比较高，而且有一定升值空间的货品，比如各类邮票、邮折之类的。其实在以后研发此类纪念品的时候完全可以参照一些限量发售的奢侈品，给每个纪念品标注上一个号码，并标明总量是多少个，就会显得这个纪念品有多么值得珍藏了。也许这种限量发售在商业运作中可被称之为“伎俩”，但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从而促进纪念品的销售。

综上所述，从知识结构、实用性趣味性兼具纪念意义以及不同价值的纪念品开发三个方面简单地谈了一下笔者的一些想法，有些想法比较具体，有些则还只有一个框架。当然设计研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以及充足的资金作为基础的。希望本文可以对今后我馆纪念品研发的方向或多或少起到一点积极的意义。

弘扬红色文化 唱响红色旋律

——浅谈人物博物馆中的红色主题

撰文 / 傅强

红色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关于红色文化的内涵，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也渐渐形成一些共识，在本文中，笔者所表述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具体来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相应的，红色文化也就应该包含中国共产党在它 90 年的光辉历程中创造的所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包括革命遗址、革命文物、革命事件和革命成果等）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包括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文艺等）。

人物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行业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的门类。它的功能在于纪念人类历史上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物——可以是政治人物，可以是文化人物，也可以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可以是纪念一个人物，也可以是纪念一组相关人物或者一个团体。人物博物馆发挥其功能的主要方式是研究、宣传和

展示历史名人的生平、思想、著述、社会实践活动和业绩等等。

目前我国的人物博物馆已超过 500 座，占我国现有博物馆的六分之一。^[1] 1951 年 1 月 8 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人物博物馆正式开馆，此后人物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人物博物馆所纪念的人物也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总体来看，人物博物馆的主流，或者说大多数人物博物馆所纪念、展示的名人，都是为民族解放、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或文学家、科学家。笔者认为，这一类人物博物馆与红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它们所纪念的人物，很多时候本身就是红色文化的创立者和引领者；它们所展出的文物，本身就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而它们所讲述的历史，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红色记忆。所以，对人物博物馆来说，红色文化应该成为其展示的重点、宣传的基调。下面，

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一、在陈列展览中突出红色主题

陈列展览是人物博物馆发挥其纪念和教育功能的基本形式。目前国内主流人物博物馆在陈列展览中都会主动将红色文化融入其中，就像上文所述，很多革命人物本身就是红色文化的创立者和引领者，讲述他们的革命历史，陈列他们的革命文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就是在宣扬红色文化。

以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为例，该馆保存毛泽东晚年遗物 6000 余件，这些遗物涵盖了毛泽东的工作、学习、生活、情感、情趣等方方面面，但是如何将这些文物组合起来，让它们共同反映一个主题，这其实非常考验展览策划者的智慧，而且就在毛泽东遗物馆的不远处，还有一个较老的陈列馆，已经将毛泽东的生平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展示。因此展览策划者在考虑陈列主题时还要有意避开已经陈列的内容，这就更增加了难度。经过慎重的考虑并结合对观众的调研，毛泽东遗物馆最终确立了以“展示一代伟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博学多思的学习特点，重点宣传毛泽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 为其主题，展览以《风范长存——毛泽东遗物展》为题，共分为“勤政为民、鞠躬尽瘁”，“反奢倡俭、清廉如水”，“博学多思、孜孜不倦”，

“亲情如歌、友谊似海”，“雅情逸趣、坦荡襟怀”五个部分，通过 832 件实物、29 张照片、14 份文印重点再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不朽的崇高理想和品德风范。

其实整个毛泽东遗物展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无论是形式设计、内容设计还是文物保护和多媒体的应用，都有其独到之处。在这里，我们仅仅从红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也会发现，整个展览是很好的将红色文化融入了其中。且不论展览的主题，就说展览中提炼出的五个关键字：勤、廉、博、情、雅，这既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精神品质的高度概括，其实也是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革命品质的高度概括。当游客面对毛泽东打了 73 个补丁的睡衣而惊讶不已时，当讲解员告诉游客这位国家主席吃饭、住宿都不忘付钱时，当他们看到毛泽东的护理记录上记载着主席在去世前一天还在坚持工作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被深深感动，而这样的精神财富不正是我们要努力要宣扬的红色文化吗？那些在参观展览后恋恋不舍、感慨万千的游客所接受的，不正是一次红色文化的洗礼吗？由此可见，人物博物馆的陈列其实与红色文化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人物博物馆，诸如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邓小平故里纪念馆、陈云故居等等，无不是在其基本陈列中凸显出红色主题，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贯穿始终，从而使得这些人物博物馆

成为宣扬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二、让讲解员唱响红色旋律

在博物馆界，对讲解员的定位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讲解员是传统博物馆模式的产物，并不适合今天的博物馆，完全可以被志愿者所取代，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讲解员的作用不过就是复述和导引，只要形象靓丽、口齿清楚即可胜任。事实上，讲解员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一个优秀的讲解员的工作不仅是陈列内容的讲述和答疑，更多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展品和观众之间的桥梁，观众对陈列主题和展示内容到底能领会多少、了解多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解员的工作。一些优秀的讲解员，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精神气质甚至代表了他所在博物馆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其实也是红色文化的一种。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就有一群穿着军装的讲解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军事化的管理，每天上班时他们需要排队后步伐整齐的到纪念馆前进行点名，随后便是班前会的训练：普通话、仪表仪态、气息练习。下班后还要抓紧时间排练节目，参加演出，用各种方式将红色精神宣讲给大家。不过，军事化的管理并不意味着讲解内容的刻板无趣，西柏坡的讲解员讲起历史事件来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又是历史事件的陈述，又是革命小故事的调味儿，更有民谣、

快板儿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但把历史事件介绍的非常清楚，更能让大家听明白、记牢固，深受游客们的好评，很多小孩子都因此对历史事件非常感兴趣，紧紧跟着讲解员走，认真地听。每次讲解完后，都会有观众握着讲解员的手不放，不停地称赞他们讲解得好，讲解员们也会感到无比自豪。因此，这些宣讲红色精神的讲解员被大家称为“红色主播”，而讲解员们则表示：“说实话，每天我在讲着同样的东西，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丰功伟绩，时时刻刻都在感染我，激励我。”^[3]

西柏坡虽然并非人物博物馆，但是他们培养的这支讲解员队伍却同样值得人物博物馆学习和借鉴，其实每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很多时候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使其区别于其他历史人物，而人物博物馆无论是在陈列展示中还是在宣传讲解中，都应突出这种精神气质。西柏坡的讲解员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很好的将西柏坡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气质，



▲ 讲解员在故居主楼内讲解

从而感染、激励游客，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内化的精神气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

国内许多人物博物馆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例，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经常开展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场所，当年宋庆龄在这里热情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宾客，而宾客们也对宋庆龄留下了“热情好客”、“优雅谦和”的印象。如今，宋庆龄故居的讲解员也试着把当年宋庆龄待客之道作为自己接待游客的准则。在主楼讲解时，讲解员并不被要求进行激情澎湃式的讲解，而是被要求从踏入主楼的那一刻起，就有意的放轻脚步、放慢语速，甚至有意压低一些音量，把自己视作一个热情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讲解员，慢慢向游客讲述当年宋庆龄在此接待各国贵宾的故事和宋庆龄在此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一种讲解方式受到了游客的欢迎，许多游客说，觉得自己就像是宋庆龄家里的客人，在主人的陪伴下在她的家里走了一遍，既了解了一段历史，也被宋庆龄的精神所深深感染。

三、在讲解内容中弘扬红色文化

除了讲解员，讲解的内容对突出红色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人物博物馆陈列的内容虽然会围绕着既定的主题，但即使对同样的展品也有着多种解读的方式和角度，如果任由游客自己

参观领悟，往往并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甚至对某些展品产生误读。

举例来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主楼是一种完全原物、原状的陈列，目前采取了游客自行参观和讲解员定时讲解相结合的参观方式。有趣的是，根据笔者的观察，许多游客在自行参观完后都会选择等到定时讲解开始后再次跟随讲解员参观主楼，所以对很多游客来说，他们会参观主楼两遍，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还曾进行过一些抽样调查，那些选择自行参观主楼的游客，往往得出的是这样一些结论：“宋庆龄住的房子很大”、“故居的设施很现代化”、“环境很好”、“陈设很简单”等等。而那些听过讲解的游客，得出的结论就包括了“宋庆龄很好客”、“宋庆龄的生活很简朴”、“宋庆龄待人平易近人”、“宋庆龄很怀念孙中山”……这样一些信息，同时，游客的满意度也较前面一种情况大为提升。陈列的内容并没有变化，自行参观与讲解员带领参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讲解员的介绍中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他不仅介绍陈列的文物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向游客讲述了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为什么故居的过道厅陈列着徐悲鸿的《双马垂柳图》？为什么故居的房间里都铺着同样图案的地毯？为什么卧室里有许多孙中山用过的物品？为什么二楼的小餐桌边，摆着两把椅子？……这些文物故事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回答了游客的疑问，更重要的是，每一

个故事其实都包含了我们希望传递给游客的信息，通过《双马垂柳图》，我们告诉游客的是宋庆龄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通过毛主席赠送的地毯，我们讲述的是老一辈领导人之间的真挚友谊；通过孙中山的文物，我们讲述的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忠贞不渝的爱情；通过李燕娥的座椅，我们讲述的宋庆龄与一位普通劳动妇女之间胜似亲情的姐妹情谊。当观众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也就实现了我们的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同时也完成了人物博物馆传播红色文化的使命。

其实在参观过程中，对展品的误读是很常见的现象，而好的讲解词就是要在既定陈列主题的框架内来解读陈列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既要减少游客的误读，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将我们的红色文化融入其中。例如在宋庆龄文物馆中陈列着一件宋庆龄穿过的香云纱旗袍。许多游客看到这件旗袍后，第一印象是很漂亮，甚至觉得它很时尚，但是我们的讲解词中却没有过多去介绍这件旗袍的材质、样式，而是告诉游客，这件旗袍宋庆龄非常喜欢，一直穿了很多年，后来宋庆龄有些发胖，旗袍穿不上了，她却舍不得重新再做一件，而是将旗袍拆开放大后继续穿着。所以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如今这件旗袍上还有两条镶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解读，新中国领导人节俭朴素的形象就给游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由此可见，一套主题鲜明、内容详

实的讲解词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对以宣扬红色文化为己任的人物博物馆来说，如果没有一套以红色主线贯穿始终的讲解词，没有在讲解词中深刻揭示展品的历史文化价值，没有讲透文物背后的故事，那么无论是从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宣传红色文化的角度来说，效果都不会理想。

综上所述，人物博物馆虽然只是我国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中的一类，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使得我国的人物博物馆与红色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大多数人物博物馆来说，红色文化其实早已深深浸透在其基本陈列和宣传讲解之中，甚至在其讲解员的身上也能有所体现。在红色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如何将红色文化与相关人物的研究和宣传结合起来，如何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如何更好地展示和宣传红色文化，这将是人物博物馆面临的新任务与新挑战。



[1] 《中国人物博物馆上海宣言》，《新中国人物博物馆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2] 《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与融合——毛泽东遗物馆的陈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3] 柏坡网：http://www.xibaipo.gov.cn/xwzx/jdxw/201205/t20120517_2789414.html

故居志愿者工作心得

撰文 / 秦琰 费佳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观众，故居自2001年起成立志愿服务队，通过与本市多所中学、高校合作，选拔优秀的在校学生参加故居志愿者队伍，让同学们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故居逐渐形成了一支基础良好的志愿服务队伍，2011年10月，我馆被上海志愿者协会正式授予上海志愿者服务基地称

号。今年初，我馆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志愿者的招募、培训、考核等一系列工作做了全新的尝试：首次通过网络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志愿者；充分利用市志协为各基地提供的网络平台和管理软件，使得我馆的志愿者管理工作更为合理、更加细致、更符合规范。现将我馆在志愿者队伍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特色及积累的经验总结如下。

一、队伍构成多样化

目前我馆拥有三支较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分别为学生志愿服务队、社区志愿服务队以及社会志愿服务队，整体呈现了人数多、组织健全、覆盖面广等特点。

1、学生志愿服务队。队员主要是来自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8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以及本市多所高中“宋庆龄班”的同学们，年龄约在16到22岁之间。



▲ 我馆成为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揭幕仪式

他们通常在双休日、节假日和寒暑假来到故居，为游客提供参观导览与咨询讲解的服务。

2、社区志愿服务队。队员多为退休在家、年龄在45岁到70岁的社区居民。这些志愿者是世博期间，为了保障参观秩序、确保文物安全，我馆与愚谷邨居委、天平街道合作在社区招募的。这些志愿者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责任心强，为人热心，擅于与人沟通，有较充足的可支配时间。因此，我馆安排他们在工作日期间承担参观导览、秩序维护及文物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3、社会志愿服务队。队员多在24岁至34岁之间，是今年初我馆首次通过网络面向全市招募的。这些志愿者大多在上海的各企事业单位、外资公司中从事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教师等工作，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及较强的外语会话能力，弥补了我馆小语种人才缺乏的不足。社会志愿者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自己的休息日来到故居服务，向海内外游客展示着上海志愿者的风采。

我馆目前拥有的这老、中、青三支志愿服务队，在年龄特征、兴趣特长、服务时间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又互相弥补。志愿者们对提升我馆的接待服务质量帮助很大，同时也使得纪念馆的宣传覆盖面更为广泛。

二、招募培训规范化

1、拓宽招募渠道、细化招募程序。

今年，我馆除了通过学校相关组织及社区街道招募志愿者外，还首次尝试通过上海志愿者网站，面向全市招募志愿者，并接受志愿者网上报名。仅1个多月的时间内，网上报名人数就达250余人。此外，我馆还细化了志愿者的招募程序，经过第一轮的初选后，在面试环节中我馆工作人员与应试者们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即可从中选出最为适合的人选，也可以让志愿者们对故居有所了解。

在整个招募过程中，我馆十分注重给予应征者及时的信息反馈。从收到报名表、初选结果产生再到面试及录取的每个环节，我馆工作人员都会以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与应征者取得



▲ 故居志愿者服务队

联系，确保每一位应征者可以获知最新的招募情况，让他们感到我馆对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视以及对所有报名者的尊重。

2、调整培训内容、强化考核机制。

今年我馆还就志愿者培训及考核制度做了调整。在培训时间安排上，考虑到志愿者们大多为在职人员或在校学生，我馆将培训的时间安排在双休日；在培训内容上，除了原有的接待服务礼仪、讲解方式与技巧、讲解词解析等内容，还增加了关于我馆馆建历程、相关历史及人物背景知识、志愿者相关规章制度等内容，我馆工作人员还就一些游客常问的问题以及在服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做了详细地介绍；在培训的形式上，包括举办讲座、讲解员示范讲解、志愿者现场观摩及实训等，我馆还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展不同主题的宣讲，让志愿者们可以全方位、深层次地了解宋庆龄。

志愿者们经过培训后即成为我馆的见习志愿者。在见习阶段，志愿者们通过现场实践，加强了对故居工作流程及展馆陈列布置的熟悉。在能胜任所有展馆的讲解后，志愿者们可以提出考核申请，或在见习期结束后参加考核，考核合格者即为我馆正式志愿者。

为使我馆的志愿者能更全面、更牢固地掌握讲解内容及相关岗位知识，我馆将志愿者考核分成笔试和口试两个环节。我馆工作人员精心编写了数套试卷，来考察志愿者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



▲ 故居志愿者在接受培训



▲ 故居工作人员为志愿者做个别辅导

笔试成绩达到85分以上才可进入口试环节。口试以抽签的方式，由志愿者对抽到的内容进行现场模拟讲解。每位志愿者通过考核后，都会收到一份考核反馈表，就志愿者考核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帮助志愿者自我总结和提高。

三、日常管理人性化

1、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志愿者权益。

我馆对原有的志愿者管理制度进行重新修订，建立了一套更全面、更完整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其中不仅对各岗位的服务流程与要求做了详细的规范，让



▲ 志愿者在主楼讲解



▲ 志愿者在进行服务活动



▲ 高校志愿者负责人员座谈会



▲ 社区志愿者座谈会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有章可依，还明确了本馆志愿者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在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为志愿者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服务品质提供便利。

2、健全管理体系、实现志愿者分类管理。

针对不同志愿者队伍的不同特点，我馆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实行分类管理。对于学生志愿服务队，从招募到日常管理主要由学校的相关组织统一安排，我馆从旁协助，适时提供相应的专业指导；对于社区志愿服务队，考虑到其队员大多为退休在家的中老年人，所以将他们的服务时间安排在工作日；对于社

区志愿服务队，由于队员本职工作忙碌，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我馆采用建立QQ群的方式，通过群论坛发布各类信息、上传学习资料、听取志愿者对我馆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及时有效地与志愿者们进行联系，同时也为志愿者之间相互交流提供了平台。

3、建立激励机制、提高志愿者积极性。

我馆为每位志愿者开通上海志愿者证来累计他们的志愿服务时间，并对每次志愿者来馆服务情况作日常考评。每到年底，我馆会开展志愿者联谊表彰大会，根据志愿者一年来的服务时间及日常考评，评选出优秀的志愿者集体和个

人，并对他们进行表彰。

此外，我馆还借鉴《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从今年起对志愿者实行了“星级认证制度”，即对于在我馆服务满1年以上并打算继续在我馆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志愿者，根据其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进行星级认证，从一星到五星，服务时间越长星级越高，认证的结果会在志愿者工作证上上进行标注，这是对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激励与肯定。

4、重视精神关怀，增强志愿队伍的凝聚力。

为增强志愿队伍的凝聚力，我馆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座谈、外出考察等活动，在加强与志愿者沟通交流的同时，也始终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例如：在世博会结束后，为表示感谢，我馆组织了全体社区志愿者前往安徽太极洞考察。在得知曾来我馆服务的叶蓓薇女士外出访友遭遇车祸住院后，馆领导立即前往医院探望，让她倍感温暖。

我馆通过营造坦诚、积极、和睦的工作氛围，让每位志愿者感受到：他是

重要的，他能够在这个组织中发挥作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志愿者们的工作热情。有的志愿者强烈要求每周都来故居做志愿服务；还有些志愿者在完成日常的接待工作外，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长为纪念馆发展作贡献：当发现我馆外文标示牌有错误时，他们主动帮忙纠正；当看到馆里消防器材快要到期时，提醒我们及时更换；更有热心的志愿者为我馆和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牵线搭桥，联系合作办展的事情。对于我馆来说，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故居的志愿者，更是故居的一份子。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志愿服务、回报社会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方式。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志愿服务的理念深入广大市民的心中。上海宋庆龄纪念馆愿意继续以故居为载体，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岗位，打造更加规范、更人性化的志愿服务平台，向有志于成为志愿者的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为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浅谈人物类纪念馆的陈列定位

——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例

撰文 / 董卫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博物馆建设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的博物馆已有三千余座，其中约有六分之一为人物类博物馆，大致有五百余座。在习惯上，人物类博物馆多又被称为人物类纪念馆。

根据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维也纳通过的经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赢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中可以看出“教育”作为博物馆重要职能的地位，而陈列作为博物馆教育的主要手段，正日益引起博物馆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搞好陈列、办好展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都知道，陈列的形式受制于陈列的内容，而陈列的内容则取决于陈列的定位。笔者通过上海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以下称我馆）的展览，尝试剖析人物类纪念馆陈列定位的出发点。（本文所指陈列为我馆辅助陈列，非故居原状陈列。）

一、从宣传的人物出发

人物类纪念馆对本馆传主的正确定位，是宣传和陈列工作的基础。如果对传主的历史地位、社会贡献等等没有正确把握，就有可能“失之于偏”。随着对传主研究的步步深入，有些原来被认为是定论的，有时也未必全面。例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陈列的传主——宋庆龄，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女性。她崇高的人格魅力和为人类和平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向来为世人传诵。然而在很多陈列中，却往往仅突出她继承孙中山遗志，反独裁的一面，而淡化了建国后她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如此，以往陈列就形成前重后

轻的格局。有鉴于此，我馆在文物馆陈列改版时，根据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大量史实资料，更为完整地展示宋庆龄建国后在各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使整个陈列更为均衡统一，更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宋庆龄。

二、从观众的需求出发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信息社会。大部分观众来馆前已经能很方便地通过网络等途径或多或少地了解传主的生平事迹。所以观众不再需要一种面面俱到的展览，也不再那么容易接受灌输式的讲述；观众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想来看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观众不是到一个“神殿”来膜拜神祇的，而是来纪念馆感受真实的。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原来惯用的那种说教式的陈列。例如：我馆在文物馆陈列改版时根据观众的需求特意增加了一个单元——“宋庆龄寓所生活”，通过展示宋庆龄在寓所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她广泛的兴趣爱好，让观众走进她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了解她对生活的热爱、对丈夫的眷恋和她对家人、友人的那份真挚的感情，从而使观众理解一个真实的伟人。

三、从所处的文化环境出发

不同的历史传承造就了各地特有的文化，而正是这些绚丽多彩的文化背景，才孕育了这些千姿百态的风云人物。我馆所处的上海，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所谓海派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传统

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文化”。宋庆龄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她从小接受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让她拥有了跨文化的眼光和视角，在她的身上，时刻体现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精神。连她所钟爱的上海寓所，也是一幢典型的西式建筑。因此，我馆在形式设计上，就试图将海派文化的风格融入其中，大理石、罗马柱、玫瑰花等陈列手段的运用，既让展馆的氛围显得不落俗套，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宋庆龄本人兼容并蓄的思想，使得陈列展览的形式和人物的内在精神统一了起来，也让展厅的内部陈列和所处的外部环境统一了起来。

四、从场馆的自身特点出发

展馆之所以能吸引观众，主要是通过专业的设计和布展，以各种艺术形式、文物资料 and 多媒体手段共同营造出一种环境氛围，既还原真实历史，同时也让人受到感染和教育。与其它类型的博物馆不同，人物类纪念馆常常依托传主的故居而建，场馆受到诸多限制，陈列条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纪念馆，往往摆脱不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窘境。以我馆为例，我馆有藏品万余件，但是文物馆的展示面积却不足二百平米，如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和不太长的展线中实现陈列意图，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

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确立了“精益求精”的原则，即创意求精、展品选精、制作做精。在创意方面，我们强调对观众需求的重视，根据受众研究和接受美学的理论，把对观众心理感受的预期带入到陈列设计的思考中。在展品选择方面，我们不仅考虑到文物自身的价值，还考虑它的“可观性”，特别注意以“少而精”的原则去选取那些最具代表性、最有可观性的文物，把我们的“精品文物”呈现给观众。在制作方面，我们特别强调了对细节的关注，例如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验，我们最后采用了用透明的有机玻璃说明牌刻上说明文字的方式替代了传统的说明牌，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让说明牌完全“隐身”，凸现了文物本身，

另一方面透明说明牌本身也显得十分精美，富有设计感。

一个展览的成功为很多因素所左右，如藏品资料的储备、研究的深度、展馆的状况、设计施工公司的能力、资金的投入、陈列手段的应用等等。虽有“长其一不足以誉之，短其一则足以毁之”之说，但真正决定一个陈列成败的还是在于它的定位。能够对传主正确定位、能够关注观众的需求、能够立足当地的文化环境和场馆的自身条件，那么这个陈列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宋庆龄文物馆开馆后，得到了观众的驻足首肯，很多观众反映：“我们在这里，好像还能感受到伟人的气息”。而这正是我们的陈列所追求的目标。

（上接9页）

罩着中国，宋庆龄于1946年7月23日跨越救济的领域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坚持法西斯统治和美国的扶蒋政策是国民党要打和能打内战的根本原因，呼吁必须立即扑灭内战的火焰，美国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然而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力图阻止或限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1946年底，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蒋介石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内战道路。当整个国家和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她当然不能离开自

己的祖国或是离开她在上海的工作。她在那一时期曾经对一位友人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2]因而，那时有许多美国友人或机构邀请宋庆龄赴美国访问或演讲，宋庆龄都没有接受。基于相同原因，宋庆龄也不会接受BFUW的邀请访问英国。



[1] 英国《下院辩论集》，第416卷，第1306-7栏。

[2] 卡斯伯格医生致爱泼斯坦信，转引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赴日办展之行疏记

撰文 / 宫洁菁

2011年9月25日至9月30日，我与部门的徐建华同志一起飞赴日本长崎，作为展品提供方之一参加“孙中山·梅屋庄吉与长崎”展的布展工作。该次赴日办展之行距今已有一年时间，但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同行们的工作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日益频繁的馆际合作办展活动，日本人的工作思路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借鉴。

旅行社

9月25日下午，我们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武汉中山舰博物馆、北京



▲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三个联合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顺利抵达日本长崎机场，来接机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姑娘山崎，会讲中文。机场离我们的目的地长崎市还有一段车程，山崎一路上为我们作简单的介绍。

言谈中我们意外地得知，这位山崎小姐并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而是旅行社的导游。也就是说，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将我们此次行程全权委托给了当地的一家旅行社，除了在博物馆布展的工作日，其余时间我们的行程、食宿、包括接机送机都由旅行社负责。

除了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礼节性地到我们所住的酒店来欢迎和道别以及在馆内工作的时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不跟我们碰面的。他们不需要全程陪同，所以不会因为要接待来访的客人而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博物馆只需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给旅行社就解决了原本相当繁琐的接待工作，当然也成功地将我们几个人在日本的安全问题等责任转交给

了旅行社。

我们国内馆际交流办展，通常都是由馆内工作人员亲自接待的，而且基本是全程陪同，吃、住、行全权负责。这样安排有利于同行之间增进交流，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周到热情的待客之道。但相对的，就必须以接待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为牺牲，或多或少耽误了本职工作；而且对于主办方来说办展期间各项事务繁忙，还要不断调配资金和人员去招待客人的食宿，关注他们的安全，如果时间短还可以坚持，时间长的话就不得不说是一种负担。因此，日本人的这种接待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借鉴。

接待

抵达长崎的当天晚上，博物馆方面为我们设下了欢迎宴，这也是整个行程中唯一一次宴请。相比国内的酒席，日方所组织的晚宴堪称简朴，就在我们所住的酒店一楼的开放式大堂内进行。简单的自助餐，将几个小餐桌拼成一长条，日方坐一边，中方坐一边，后面拉了一条欢迎会的横幅。

在饭桌上仍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入骨髓的循规蹈矩。大家正襟危坐，待日方领导十分认真、严肃地发好言，致完欢迎词，宣布晚宴开始，大家才展露出笑容，开始进餐。晚宴备有红酒和清酒，但没有人劝酒，一切出于自愿，喜欢喝就多喝些，不喜欢就喝饮料。双方或通过翻

译或连比划带猜地进行沟通，气氛倒也轻松。看到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日方领导再次认真严肃地致结束词，宣布晚宴结束。整个过程不足一个半小时。

在博物馆布展时的午餐是在馆内的西餐厅里解决的。一人一份餐食，我们六人的费用由博物馆承担，而陪同我们就餐的两位工作人员则必须得自己支付自己那份。席间没有过多的寒暄，吃完大家就马上回到布展现场继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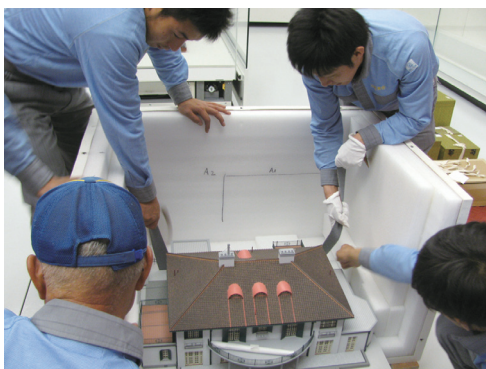
长崎很小，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步行。遇到需要车接送的情况，博物馆就会为我们预定两辆出租车，每次都是如此，从未使用过公务用车。

我们国内接待合作办展方时，一般都会以该馆的最高标准设宴，并且不止一次。接待全程会尽量给客人提供方便，以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为目的。当然，这么做最终取得的结果一定是双方满意，友谊长存；但与此同时，花销也是成正比增长的。相对的，日本人讲礼貌但不讲排场，礼数到了就可以了，决不铺张浪费。或许在某种场合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的这种点到即止的节俭理念。

布展

在馆内布展的几天是这次日本之行让我收获最多的。日本人按部就班、一丝不苟的个性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还是很有裨益的。

我们在国内与别的馆合作办展的机会很多，每次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当然，



▲ 工作人员将故居模型取出



▲ 工作人员在整理人体模型

布展过程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因为大家的理念、习惯都是一样的。但这次在日本布展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工作方式，虽然展览最终出来的效果差不多，但布展期间的工作方式和氛围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身上不乏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他们做任何事之前都会先制定非常完备的行动计划，并且有固定的流程。因此，即使是赶进度的布展现场也是井然有序的。得益于事先的周密计划和详尽布置，每个人不用领导指挥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都按计划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没有扯皮现象，也不会出现有人忙有人闲的情况。

整个布展期间除了移动物件时必要的沟通，偌大的展厅里一直都是很安静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计划做得周全，已经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不需要在现场商量；另一方面则是工作人员的敬业，大家来来回回忙碌穿梭，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休息或者闲聊。当然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分工，自己负责的一块区域要自己想办法在规定的时限里完成。这次展览的总负责海江田先生本人也一直在展厅里忙碌，但并不是在指手画脚，而是一个人默默地做具体的事，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因为他是总负责而帮忙或围观，在各司其职的布展现场，总负责也就只是个普通的布展人员而已。

此外，尤为令人惊诧的是，整个布展现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片纸屑，没有一处垃圾。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日本人会非常顺手地把纸屑等小垃圾塞进自己的工作服裤兜里，大垃圾则是随时清理随时带出展厅。这种自觉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对他们而言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不仅是布展现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会这么做。



▲ 长崎市貌

见闻

跟日本其他城市一样，长崎给人最大的感觉也是干净。马路、洗手间、酒店、餐厅、高速公路服务区……不论哪里，都基本可以说是一尘不染。长崎人口不多，也不是热门的旅游城市，有些观光点一天也没几个人光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地方还是极为干净整洁，就连供人搀扶的栏杆上也摸不到一点灰尘。

日本让全世界感叹的洁净度缘于他们对国民自幼就开始的教育，一代传一代，继而成为一种强烈的习惯。这一点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我们在某纪念公园参观时，遇到一群日本小学生，他们席地而坐，正巧到了午饭时间，他们便拿出自己书包里各种各样的食物开始野餐。过了一会我们再次经过那里时，学生们已经离开了，但他们坐过的那块地方仍然非常干净，没有一丁点食物残渣。

早已耳闻日本人对小空间的利用能力很强，这次终于眼见为实。我们所住

宾馆的房间，不足十平米，偏就被装修得十分怡人，住在里面不觉得压抑，甚至感到很温馨。高品质的设施设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人充分利用空间的精湛设计，真正做到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但是宾馆设计，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包括他们的展览设计。我甚至觉得相比于大场地，日本人对小场地的设计会把握得更好。

长崎并不属于日本的发达地区，还在二战时遭受过重创。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就已经能恢复到这个程度还是让我觉得讶异。这个城市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我不甚了解，但就我走马观花的所见所闻而言，仅“宜居”这一点，就已是做得很不错了。

总结

应当承认，日本人某些方面的优点是确实存在的，例如严谨、认真，有礼貌。我们可以理性分析，把他们的优点作为我们自己开展工作时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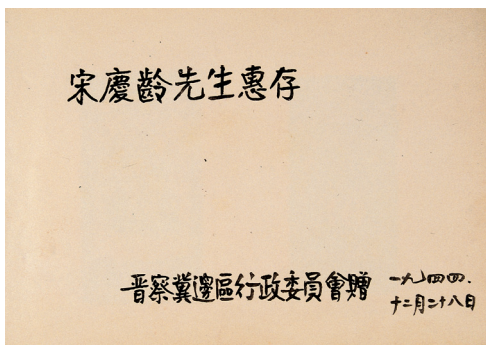
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合作办展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通过这次合作我们了解了不同国家的同行们的工作方式，也亲眼看到了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我们有我们的特点和长处，但他们也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为工作带来新的启发和动力应该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最大目的。

宋庆龄收藏的边区票样

撰文 / 麦灵芝



▲ 宋庆龄收藏的晋察冀边区票样



▲ 宋庆龄收藏的晋察冀边区票样扉页

宋庆龄收藏有一本装订成册的纸币票样，绿色的封面上除了“票样”二字外，下面还有行小字：“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制”。翻开这本票样册，第一页上书写有：“宋庆龄先生惠存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

员会赠，1944年12月28日”。之后几页分别张贴着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各种不同面值的纸币票样以及若干张正币、兑换券和公粮票。

一. 晋察冀边区与边区银行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山西、察哈尔、河北接壤地区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边区行政委员会是该地区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八路军先后开赴华北对日作战。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在河北阜平召开大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5日，大会发表通电，向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31日，国民政府批准后，正式命名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它的成立使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规得到了统一，

稳定了社会秩序，被中共中央称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然而由于日寇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也很匮乏。晋察冀三省沦陷时，社会上货币极为复杂，货币流通也十分混乱，唯一合法流通的“法币”越来越少，各地方银行，商号及投机者乘机滥发地方小票，日伪币也侵入边区流通。各种钞票充斥着三省的市场，给边区三省的物资交流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打击日寇垄断华北金融的图谋，保证军需和边区经济建设计划的实现。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了敌后根据地最早的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是经过国民党中央政府核准的地方合法银行，并发行“边区法币为调济边区金融统一边区货币之中准法币”^[1]。刚开始发行有20枚铜元、一角券、二角券、五角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伍拾元、壹佰元10种票子。后来又发行了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5种大面额的纸币。边区银行的建立和货币的发行，使边区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稳定了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对发展边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形势的发展，1948年春，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组成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建制撤销后，晋察冀边区银行也于同年

停止发行货币与冀南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

二. 宋庆龄与晋察冀边区

宋庆龄虽然没有到过晋冀察边区，但却和边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为边区军民的抗敌斗争提供过很多可贵的支持与援助。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的真实情况，呼吁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在宋庆龄的呼吁及多方努力下，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通过“保盟”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包括药品、医疗设备、食品、经费等众多援助，这些援助对象自然也包括晋察冀边区。1938年9月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商议，决定把由白求恩建立的晋察冀边区五台山的一所八路军医院改建为伤兵医疗中心，定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不久英国援华会向“保盟”提供2450英镑，协助筹办国际和平医院。翌年3月，“保盟”在《致友人的募捐信》中，提出希望国际和平委员会帮助开办一批有250张床位的医院，同时详细介绍各抗日根据地需要帮助的一些医院的情况。此后各根据地也先后建立起多所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前方流动医疗队和医科学校。这些战地医疗机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在救治伤员、预防疾病、提高边区公共卫生水平等方面都

起到很好的作用。为了保证这些医疗机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宋庆龄还先后向国际和平医院派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1939年12月16日，宋庆龄致函尼赫鲁，信中说：“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你们已作出决定：你们医疗队的工作将继续在西北地区进行下去，这个地区严重缺乏合格的医务人员和医疗用品，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个医疗队的非常好的服务。我十分遗憾地告诉你，由“保卫中国同盟”扶持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已经与世长辞了。五台山这个地方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交通运输竟是那样的困难，以致我们在六个月以前运送给他的医药用品在他上个月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运到……也许这些物资已被敌人的飞机所炸毁，也许还在路上。”^[2]为帮助边区发展医疗事业，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从医院的创办，到医生和护士的配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给，都给予了大量的长期的支援。由于边区处在遥远而偏僻的内地，加上敌伪的封锁，许多国外募集来的物资来华后，“保盟”又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克服千辛万苦，才能把它送到目的地。宋庆龄领导“保盟”为边区的抗战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由此来看，当年晋察冀边区委员会赠送这本票样册，不仅是向宋庆龄传达边区经济建设的讯息，更是为了表达边区军民对她长期不懈地援助边区的敬意。

三．边区票样及其价值

翻开这本手工装订的边区票样册，其中主要是1938年至1944年间晋察冀银行发行的部分纸币票样。这当中有1938年发行的1角和5角的纸币，1939年发行的1元和2元、5元、1940年发行的2角、10元，1944年发行的50元、100元、500元的票样等。虽然这些纸币所用的纸质量较差，也不统一，但版面设计却形式多样，票面图案既有海滨、山村、水乡等自然风光，也有宝塔、万里长城、天坛等名胜古迹。还有耕地、牧羊、牧马、收割、运肥等生产、生活景象。大部分图案反映了当时边区的政治、经济、农林牧业生产、建筑风貌、自然景色。边饰花纹也多种多样。纸币的颜色有红、绿、棕紫等多种。所有纸币都采用正面为中文，背面为英文的格式。角券多采用竖式，背面有经理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的中文签名；元券多采用横式，背面有经理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的英文签名。

在这本票样册中有边区银行最早发行的壹角纸币，为竖式，正面呈棕色，背面呈绿色。正反两面都有二个大大的空心字“票样”。纸币的正面上端横印着“晋察冀边区银行”七字。中间为亭桥图案，下有横排“壹角”二字。下方印有“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字样。背面为英文，四周为花纹图饰，中间是大写的阿拉伯数字“10”，还有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

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的签名。

另一张早期的伍圆纸币为横式，正面为红绿两色，背面呈棕绿色，正面上端印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七字，红色长方形花纹框，四角均印有“伍”字，中间印有长城的图案及竖印“伍圆”二字，下端印有“凭票兑付国币伍圆”以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等两排字样，背面为浅绿色花纹底版，上端印有一排英文，中间为一园林图案，两侧分别印有“5”字和经理、副经理的英文签名。正反两面同样都有二个大大的空心字“票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张纸质正面的下方分别印有“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和“凭票兑付国币伍圆”几个字。国币指的是当时国民政府规定的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法币”。因为边区银行刚开始发行货币时，银行的储备，依靠的是边区的物产和一部分法币作为准备金，所以在发行初期，老百姓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到银行用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兑换“法币”。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在边区金融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晋察冀边区银行逐渐增大纸币的发行量，面值也逐渐升高，并将日伪货币、国民党的法币及各地方杂币挤出了金融市场。所以后期发行的纸币就没有这些字了。

除了票样外，这本票样册里还有几张是正币和公粮票。其中两张发行于1944年的高面额兑换券，分别为壹仟元

和伍仟元。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面额的兑换券在发行不久后就被收回销毁了，所以存世极少。此外，票样册中还有几张印制极为简易的公粮票。

这本票样册已历经了近七十年的岁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属于一种战时地方性货币，从中体现的是当时社会经济状态和社会情形，具有当时中国国情和抗日战争的鲜明特色。这本票样册汇集的是抗日根据地地域内的“特区货币”，为人们了解研究抗战时期，边区军民与敌人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里展开经济斗争的情况，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史、银行史、货币史、边区的军事发展史等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透过这些票样，从中也可以了解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生活，对研究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经济状况等方面也具有参考价值。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1948年停止发行后，收交较彻底，目前存世量很少，成册的票样恐怕更是绝无仅有。再加上这本票样册是边区政府专门送给宋庆龄的礼物，又为它平添了更多的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成为抗战时期宋庆龄支持边区军民抗敌斗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之一。



[1] 《抗敌报》，1938年3月31日。

[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至第165页。

几张珍贵的照片 一段难忘的记忆

撰文 / 郑培燕



▲ 张琦珍赠送给宋庆龄的照片，摄于1962年。

这张照片中的女士叫张琦珍，已经于1998年过世。她退休以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铁路职工。然而，这位普通女性却有着一段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难忘经历。

时光回到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

主义，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钦佩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赤诚，决心给他们以支持，作他们的后盾。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与何香凝等一起，顶风冒雪前往真如、吴淞等十九路军前线进行慰问，与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亲切交谈，热情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在枪林弹雨中对战士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为了解决伤兵的急救和治疗问题，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等积极奔走，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了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的国民伤兵医院。孙中山先生的好友、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交大条件最好的一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支持宋庆龄的这一义举。医院有300个床位，可以容纳大约500-600名伤兵。宋庆龄不仅亲自担任理事，主管医院的事务，多方奔走为医院募集资金，还经常亲自到病房慰问抗日受伤的战士，鼓舞他们的士气。由于其中不少伤兵是

广东人，她特意购买了《小桃红》等大量广东音乐唱片放给他们听，以慰思乡之情。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伤兵医院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救死扶伤后结束。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十九路军将士们却牢记伤兵们在这里受到的关心和治疗，对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和主持国民伤兵医院深怀感激。

张琦珍当年便在宋庆龄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里服务，与她共事的还有黎沛华、梁丽芳等人。她们每天都在宋庆龄身边，协助宋庆龄处理伤兵医院的很多事务，随同宋庆龄慰问战士等。有时，她们还应邀到位于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今香山路）的宋庆龄家中做客。多年以后张琦珍依然记得当年宋庆龄家中有一只大狗，站起来比人还高，身材娇小的张琦珍每次看到它都觉得很害怕。



▲ 1932年2月宋庆龄在吴淞残垣旁手持炮弹留影。



▲ 1932年国民伤兵医院全体职员合影，宋庆龄右侧第四人为张琦珍。

由于一直协助宋庆龄工作，张琦珍与蔡廷锴、杨杏佛以及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都相识。张琦珍清楚地记得她与梁丽芳等陪同宋庆龄去闵行野餐，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也参加了，大家还一起拍照留念。

最令张琦珍难忘的是国民伤兵医院结束时，宋庆龄赠送了一枚孙中山奉安纪念大铜章给她留作纪念。当年，宋庆龄嘱咐张琦珍要“将铜章保存好，因为这铜章为数极少，中国四万万同胞，能得到一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国民伤兵医院结束后，张琦珍与宋庆龄分别。后来，张琦珍于1938年结婚，爱人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婚后，张琦珍加入了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蚂蚁社团”，又称“蚁社”。“蚂蚁社团”是“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联合李伯龙等进步人士成立的职业青年文化团体，后来成为有名的抗日救亡团体之一。“蚁社”设有蚂蚁剧团和蚂蚁歌咏团。蚂蚁剧团由李伯龙负责，通过剧团的演出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当年优秀电影艺

术家顾也鲁也是“蚁社”成员。经李伯龙介绍，张琦珍加入了“蚁社”，经常参与一些演出，与文艺界人士接触颇多。

1951年张琦珍的爱人因病去世，张琦珍受到组织上的照顾，进入丈夫生前工作的铁路部门工作。当时铁路机务段的工人大多数是文盲，张琦珍便担任了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1956年，上海全市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张琦珍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上海市扫盲积极分子。1960年，出于工作需要，张琦珍被调到铁路职工食堂担任售票工作。

张琦珍唯一的儿子方国泰，1954年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越演员训练班（后改为上海戏曲学校）学习越剧，后在上海越剧院实验剧团当演员，母子俩生活得很好。

尽管与宋庆龄已经分别了30余年，张琦珍却时常回忆起当年在宋庆龄身边，跟随宋庆龄在伤兵医院四处奔波，聆听宋庆龄教诲的日子。在张琦珍的记忆中，“孙夫人”宋庆龄常常教导她们要怎样为祖国争光，怎样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儿，

使她们深受教育。张琦珍牢记宋庆龄的话，始终珍藏着宋庆龄赠送给她的那枚珍贵的孙中山奉安纪念铜章。敌伪时期，张琦珍将这枚孙中山纪念铜章埋在泥土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取出来。当年与宋庆龄一起拍的合影，张琦珍也精心地保存着。

自与宋庆龄分别以后，多年来张琦珍屡次想提起笔向宋庆龄写信问好，想与宋庆龄谈谈阔别30余年之中的家常事情。但是她又有许多顾虑，毕竟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定然忙于处理各种国务活动，而且也不知道宋庆龄是否还记得自己。因此，写信的念头又一次次被打消了。

1963年7月7日，张琦珍终于决定给宋庆龄写一封信，希望能与宋庆龄见上一面。张琦珍将当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以及一张自己在1962年拍的照片随信寄上，希望宋庆龄看到照片能记得她。张琦珍的信寄到了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寓所。当时宋庆龄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住在北京，张琦珍的信很快被转



▲ 1932年宋庆龄与宋子安、梁丽芳、张琦珍在郊外合影。



▲ 1932年宋庆龄与杨杏佛、宋子安、黎沛华、张琦珍等在郊外合影。



▲ 1932年宋庆龄在交大国民伤兵医院与张琦珍、梁丽芳及南洋广肇义学童子军部分团员合影。



▲ 宋庆龄与张琦珍 1932年合影

到了北京。不久，张琦珍便收到了宋庆龄7月11日的回信。在信中，宋庆龄感谢张琦珍30年来时刻惦记着她，也鼓励张琦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取得更多更新的成就。就与张琦珍见面一事，宋庆龄告知因为身在北京，待到上海后有机会时便约张琦珍见面叙谈。

关于随信寄上的照片，张琦珍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今附上相片三张，二张是我与您在前二年前同照的。您看到这张照片能记得我吗？另一张是我在去

年照的，给您作纪念。”单从信的字面上看，最后一句“另一张是我在去年照的，给您作纪念”明确表明那张单人照是给宋庆龄的，并没有说明其余几张照片如何处理。宋庆龄非常细心，将张琦珍的单人照片留下，将其余几张连同回信一起又寄给了张琦珍，并在回信中说：“你寄来在1932年时我们一起拍的照片是送给我作纪念的呢？抑或要还给你？请回信告知。”虽然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却能体现宋庆龄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上的细致入微。

宋庆龄的回信中还附有黎沛华给张琦珍的信。当年黎沛华与张琦珍共同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对张琦珍印象也很深刻。1963年7月，黎沛华正在北京，从宋庆龄处得知张琦珍还记得自己，便也给张琦珍写了封信致以问候。

遗憾的是，宋庆龄自1963年以后经常住在北京，国务活动繁忙，其间返回上海也多是因国务活动需要或身体状况不佳回来养病，加之自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因而，张琦珍没能如愿与宋庆龄见面叙谈。

1998年，张琦珍在上海去世。那封回信和寄还的照片，由他的儿子方国泰先生继续精心保存着。今年8月29日，方国泰先生携夫人来到我馆，将宋庆龄和黎沛华分别致张琦珍的信和照片捐赠给了我馆，我们非常珍视这些文物，也感谢方先生的无私之情，让这段难忘的记忆与这些珍贵的文物永远留存下去。

纪念馆藏品的保存环境刍议

撰文 / 徐建华

藏品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藏品如果管理不善，保护不好，一旦遭到毁坏，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即使能够按照藏品的原样制作出来，或者能够找到相似的物品进行代替，也失去了原物固有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纪念馆必须重视和加强藏品的保管、保护工作，为藏品延年益寿创造良好的收藏环境，使之在纪念馆中得以更好的保存。

藏品不论在库房收藏、陈列展览、鉴赏研究、养护修复等各个环节里，都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使文物处于适宜的环境中，阻止或延缓其自然损坏过程。影响文物质量的环境因素，主要是环境气候、空气污染、光线辐射、昆虫危害、微生物繁殖等。文物的损坏，并非某一种因素单独在起作用，而常常是几种因素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为了更好地保存藏品，需要对纪念馆的环境进行系统研究。

一

在环境因素中，最基本的并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空气的温度和湿度。空气温度是空气的热冷程度，简称气温。空气湿度是空气的潮湿程度，以空气中水汽含量的多少来表示。湿度的概念有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两种。绝对湿度是体积空气中所含的水汽量，即空气中水汽的密度，相对湿度是指一定空间内，空气实有的水汽压与相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的百分比。

气温愈高，饱和水汽压愈大，相对湿度就愈小。反之，气温愈低，相对湿度愈大。绝对湿度是空气中所含水汽的实际重量，一般不受温度的变化影响，但相对湿度却随温度的变化而显著地变化着。气温是影响相对湿度的主要因素，当绝对湿度相同，而气温不同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相对湿度。

由于影响气象波动的因素很多，气温、湿度皆在经常地变动着。不论什么

地区，若仅靠自然环境提供的温湿度条件来保存文物，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所以，有必要首先探讨纪念馆的气候。纪念馆气候，系指纪念馆建筑内外空间的大气特征，即纪念馆的小气候。摸清纪念馆的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规律及对藏品的影响，会为我们创造良好的纪念馆环境气候提供参考。

二

衡量纪念馆气候环境的主要标志，是建筑物内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目前已基本公认的纪念馆建筑物内环境气候的标准数值是：温度 15—25℃，相对湿度为 45—65%。在此数值范围内缓慢地波动，对保存文物是适宜的。但这是泛指各类文物而言，不同质地的文物，有其更严格的温湿度控制范围，即最佳保存环境。如木器漆类藏品库房相对湿度为 55—65%；纺织品、纸质类藏品库房相对湿度为 50—55%；金属类藏品库房相对湿度为 45—50%，有条件者金属类藏品库房的相对湿度可控制在 35%。

做到文物分类收藏，区别控制环境气候，是最理想的办法，但目前实现这个要求，尚有实际困难。在一般条件下，首先要控制在泛指各类文物的标准数值范围。纪念馆建筑物内气候的波动，只允许逐渐改变，不仅要求在一年内的变化，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就一日而论，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变化也不能过于剧烈。一般认为，气温日较差不得高于 2—5%，

相对湿度的波动不得大于 5%。纪念馆室内湿度在上述标准范围内逐渐正常波动，一般不会造成藏品损坏。

对文物破坏的基本因素是水，既然水是文物的危害者，那么纪念馆室内空气湿度的控制，则成为评价文物保存环境妥否的关键。防潮湿、防干燥是改善文物保存环境的必要措施。

有机质地制品是纪念馆藏品中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对湿度要求尤为严格。漆、木、竹品的原料为木质纤维材料，纸张原来亦为天然植物纤维，丝织品的原料为丝素纤维，他们都是吸湿性物质，对干燥最敏感。它们一般都含有水分，在干燥到与周围环境处于平衡状态时，仍含有一定比例的水分。考虑到漆、木、竹器及书画、纸张、纺织品等有机纤维质地文物，易于处于失水干脆的特点，所以把此类文物所需相对湿度的安全下限定为 50%。

相对湿度的安全上限定位 65%，这是比较合适的数值。因为湿度过高，纸张、纺织品等有机质地材料制品，就成为微生物的良好养料。空气湿度过大，对文物的破坏作用除微生物破坏之外，还有机械破坏和化学破坏。

三

纪念馆室内的气温、湿度是随室外气温的波动而相应变化着。季风、降水、日照、观众流量等都直接决定着室内气温和湿度指标的升降。纪念馆要获得稳

定适宜的气候环境，仅靠自然调节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技术措施，调节控制纪念馆室内的温湿度，才能可靠有效。为了控制纪念馆室内的温湿环境，需要根据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以下措施。

1. 安装空调系统。保证藏品库房和陈列室内的空气温度、相对湿度，恒定在标准范围之内。

2. 减缓室内不良气候的干扰。应掌握室内外气候规律，在气候不宜的季节，库房应紧闭门窗，陈列室开放时亦应关闭窗户，挂窗帘，减缓空气对流和日光辐射。在室外气候适宜的季节，可开窗通风降温散湿。这种利用自然通风控制室内温湿环境的方法，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3. 使用温湿度调控设备。每个纪念馆普遍装备自动空调设备系统，目前尚难办到。但在温湿环境不佳的房间或者不利的季节，单独使用调温设备，用机械方法缓和温湿状况是应急措施。如使用柜式恒温湿机、窗式空调器、挂壁式空调器、去湿机、加湿机、冷热风机等。

4. 控制文物柜、陈列柜的小环境。纪念馆开馆后，室内外空气对流是难免的。将文物至于陈列柜中，并尽可能封闭紧严，使柜内免受外界干扰。实验证明，柜子可以避免温湿度的剧烈变化，柜内温湿环境稳定，对减缓室外气候影响行

之有效。木质框架的玻璃柜，年久易变形出现缝隙，应改用强度大，结构严紧的铝合金框架陈列柜，并加密封垫圈，这样的柜子对温湿度控制能产生满意的效果。

5. 使用调湿材料。在文物柜、陈列柜内放置具有调节湿度性能的材料，以改善柜内的湿度环境，这是控制藏品保存环境常用简易且有效的方法。

当然，除了环境气候，还有光线辐射、生物危害，我们都要加以重视。对文物的保护有治和防两个方面，但长期持之以恒的任务是预防，即创造一个良好的保存环境，尽可能使藏品不再发生自然损坏，并可长久完好的保存下去。我馆存有各类质地的文物有一万多件，基本都是近现代时期的。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之保护得当，藏品损坏情况并不突出。良好的环境不仅是人们生活所必须，对文物保护同样重要。稳定、洁净的环境是实现文物预防性保护的前提。

为此，纪念馆应当有益于文物的保存，始终使文物处于一个适宜的环境中，无论在库藏、陈列、鉴定、研究、修复和保养等各个环节里，都要维持一个使藏品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我们应当运用目前先进的环境监控技术，建立藏品保存环境监测平台，提升藏品保存环境，从而更好地、不断地发挥其藏品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为人民服务。

浅谈桂花的日常管理

撰文 / 徐世伟

每当金秋送爽之时，故居四处都散发着桂花的幽香，令人心醉神迷、精神倍增，这得益于故居栽种的几株桂花树。桂树一年四季枝叶浓绿，逢花期花香四溢，给人们增添了许多的生活乐趣。然桂花虽美，桂香沁人心脾，但是桂花的日常养护管理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平日工作中，笔者对桂花的枝叶修剪和日常养护颇感兴趣，这里谈谈自己的感想和经验。

桂花（学名：Osmanthus fragrans，英文昵称：Sweet Tea Olive），原产地中国。桂花为木樨科常绿阔叶乔木，品种很多，常见的有四种：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桂花味辛，可入药，有散寒破结、化痰生津的功效。桂花喜温暖湿润的气候，耐高温而不耐寒，为温带树种。

桂花叶茂而常绿，树龄长久，秋季开花，芳香四溢，是中国特产的观赏花木和芳香树。桂花为常绿阔叶乔木，高3-15米。树冠可覆盖400平方米。树冠

多为圆球形，生长3—5年的桂花树冠为长圆球形或扁圆球形。整个树型浑厚丰满，叶色浓绿，郁郁葱葱，细致下垂，婀娜多姿，十分壮观。

露地栽培地栽桂花多于早春进行。栽植地点要选择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的地方。种植前多施有机肥料，同时增施一些草木灰，苗木需要带土移植，以利成活。栽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1、适时浇水。浇水要在新梢发生前少浇，阴雨天少浇，夏秋干旱天气需多浇。桂花开花期间尽量少浇水，水分过多则花易落，使花期缩短。

2、巧施追肥。桂花喜有机肥，入冬前施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早春，以速效性氮肥为主，腐熟的豆饼、猪、禽类等肥兑水施入，促进新梢旺盛生长；6月底至7月底，施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施用磷、钾肥，促进夏梢的生长。在管理实践中，还应该根据桂花生长势来确定施肥种类和数量。如在夏梢数量少于

10-15%时，表明树势较弱，应增加氮肥施用的次数和数量。施肥还要做到因地制宜，合理安排。

3、适当修剪。桂花萌发力强，每年抽梢1-2次。因此要使桂花花繁叶茂，需要适当修剪，一般在秋季开花后进行一次修剪。根据植株生长势，除把过密枝疏剪外，还要把夏秋徒长枝剪去，使每个侧枝上均匀留下粗壮短枝。等二次修剪在早春萌芽前进行，把枯枝、细弱枝，病虫枝剪去，以利通风透光，促使桂花孕育更多饱满的花芽。桂花修剪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注意剪口要平，不留树杈，以免形成死结。

(2) 注意剪口的位置，要注意剪口芽的选留合格强弱。

(3) 修剪的季节的确定，修剪一般在晚秋时进行，但在早春树液开始流动前进行修剪，伤口愈合最快。

4、病虫防治。因管理不善桂花常易发生炭疽病、褐斑病、叶斑病和介壳虫、毛虫、红蜘蛛等的危害，需及时喷药治疗。常见的病虫害症状及防治方法如下：

(1) 桂花炭疽病。叶上病斑呈半圆形或长形，边缘红褐色，中间浅褐色或灰白色，大小不一，后期病斑可出现黑色小点。南方梅雨季节容易发病。有次病症的树要精心养护，发现病叶及时除掉，发病后喷洒25%炭特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连续防治2-3次。

(2) 桂花褐斑病。受害叶片开始出现



▲ 桂花炭疽病



▲ 桂花叶斑病

小黄斑，后渐变为黄褐色至灰褐色，病斑近圆形或不规则形，或受叶脉限制扩展而呈多角斑状。病斑直径2~10毫米，外有一黄色晕环。病部在潮湿天气产生黑色霉点。防治时结合修剪，摘除病叶，清除地下落叶，集中烧毁或深埋，减少初侵染来源；加强栽培管理，切忌土壤积水，注意通风透光。增施腐殖质肥料和钾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期间可喷洒1:2:100石灰倍量式波尔多液，或50%苯来特可湿性粉剂1000~2000倍液，或50%代森铵1000倍液。

(3) 桂花叶斑病。这种病症是桂花



▲ 介壳虫

最为常见的病症。发病初期，叶尖或叶缘出现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灰褐色斑块，边缘深褐色，后随着病情蔓延发展，斑块上出现细小的灰黑色霉点，并相互交错融合，造成叶片组织大面积坏死，干枯苍白，光合作用受阻，生长势减弱，开花稀疏，甚至植株僵死。高温、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发病较为严重。防治时应加强栽培管理，切忌偏施氮肥，氮、磷、钾要平衡供应，避免土壤积水，保持良好的通风透气性，提高植株抗病能力；高温高湿季节要定期喷药预防，用75%可湿性粉剂500至800倍液有良好的效果，每周1次，连续2至3次。一旦发现病害，就要及时摘除病叶，集中烧毁，以减少传染源，并喷洒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00至300倍液，每隔7至10天1次，直至病情被控制住为止。

(4) 介壳虫。一般在枝干、叶、叶柄的表面吸取汁液，严重时枝条被虫替覆盖，如同涂了一层灰白色的蜡质物，枝条表面凹凸不平，树势衰弱，甚至枯死。



▲ 毛虫

虫害发生时可喷洒歼灭10%乳油300-400倍液，或波美5度石硫合剂。通风透光可以减少或避免发生此病虫害。

(5) 红蜘蛛。叶片受害时，初期出现很多浅绿色小斑点，渐渐扩大连片，严重时全叶失绿出现大量黄白色斑点，最后焦枯脱落，被害芽失去发芽能力。发现虫害及时喷施扫螨净4000倍液，或40%水铵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20%灭扫利乳油1500倍液，交替使用效果显著。

(6) 毛虫。主要危害叶片，残害叶脉，将叶咬成缺口或洞，影响美观，同时影响植物生长，可以用80%敌百虫800倍液，或用80%敌敌畏乳液1000倍液喷雾。

桂花耐强光，喜温暖，忌积水，怕煤烟。所以桂花的养护和日常管理就必须遵循其生长习性和生理特点，栽植地点要阳光通透，空气清洁，不可有大量煤烟粉尘；浇水适当，生长季节浇水需看干湿；冬季需施适量有机肥，这样桂花才能够生长良好，持续芳香，为我们的故居年年营造轻松怡人的参观环境。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

选译（连载）

译文 / 宫洁菁

【译者按】

本书的作者是海纳·帕库拉（Hannah Pakula），美国著名传记作家，与书中的主人公宋美龄是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校友。帕库拉耗费10余年撰写此书，于2009年出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推崇这本传记是“盖棺定论的权威之作”。

本书撰写采用编年体形式，从1866年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在海南岛出生写起，一直写到2003年宋美龄在纽约病逝，跨越三个世纪，中间穿插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战乱和宋氏家族的兴衰。

书中作者引用的材料除了当时公开的文件、报刊文章之外，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主要是外国记者、顾问等人的记录，包括宋子文在美期间的文件）。这些材料有的是公开出版的，有的保存在美国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出现的大量宋美龄写给爱玛·米尔斯的信。爱玛·米尔斯是宋美龄在威尔斯利学院的同学，最好的朋友，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宋美龄

写给爱玛的信十分坦诚，以至于她多年后要求爱玛销毁一些过于私密的信。这些信现在已经公开，并且出版了一本书《蒋介石夫人和爱玛·米尔斯小姐》（*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书中有关宋庆龄的叙述和描写多引用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西恩的原文，对于宋氏家族的介绍，不乏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和独特的新视角，值得研究者们探索。现节选书中一些与宋庆龄、宋氏家族密切相关的章节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7

（中国的）婚姻体系就像一套茶具。
这世上谁会只想为茶壶配一个茶杯？

——匿名

庆龄嫁给孙的戏剧性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美龄和子文还在大学里，他们在两年后回到了中国。“想想看，”庆龄在孙广东的总部写信给蔼龄，“小美



▲ 美国留学期间的宋美龄

龄今年6月份毕业，7月份就要回来了……她是个很受欢迎的少女，非常享受她在学校的生活。”

火车离开纽约中央火车站后，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写信给她最好的朋友，爱玛·米尔斯，说她“完全垮掉了。”她没有被“乏味的”穿越加拿大的火车之旅所鼓舞，这旅程只让她感到“紧张和头痛”，她不喜欢加拿大人。女人们穿着邈邈，每个人看上去都“极度无知并且心胸狭窄。”在一个车站，他们看到一辆载满了中国苦力的火车。“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死去了，”美龄写信给爱玛，“他的家庭得到150美元！这就是他们生命的价值。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我会禁止苦力输出，因为中国需要自己的劳动力来开发矿源。”

这段西方旅程最精彩的部分显然是



▲ 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

在温哥华饭店停留的时候。她和哥哥，就是她提到的子文，决定要在旅程中挥霍一番，他们尽情享受饭店的奢华。“每顿饭给服务生的小费，”她写信给爱玛，“比我大学里一个月的零用钱还多！”美龄为他们的奢侈行为辩解，说一旦回到家，他们就再也不能“像现在一样没有责任感了。”

既然她已经决定了要好好享受旅程，那么在回中国的长途海上旅行中发生不可避免的浪漫情节也就不足为奇。“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他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法国人，”她在回家后三星期写信给她的朋友。这个男人是个建筑师，要去苏门答腊，向美龄求了婚，还来上海看她；她的家庭，绝不会允许她嫁给一个外国人，他们看到他时显得十分紧张，信的最后她说“大家都非常不

自在。”回到家后，她还被一个她称作H.K.的人追求，这个人经常和一个朋友一起从北京过来看她。“我喜欢他们，不过仅此而已，”她写信给爱玛。另外一个追求者——尽管有妻子和家庭——是陈友仁，《上海时报》的编辑，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他很聪明，才华横溢，但是非常的自私自利，也很自负……他这个星期要来拜访我，我希望我不会表现得很无礼，”她写道，还补充说自从回到上海她参加了“很多晚宴，茶会，和其他活动。”一个月后，她说，这一个月里只有一个晚上是既不在家里招待宾客，又不去别的地方参加晚宴的。

美龄一回来，就开始担任管家，这是个很大的家，她描述为“上海最可爱的房子之一。”她的责任包括管理12个佣人——7个男佣和5个女佣。“告诉你这可不是开玩笑！”她写信给爱玛。房子有四层楼高，有16个大房间，还有厨房，浴室，阳台和门廊。房子在霞飞路上，上海最长的马路，离市中心很远，这样显得更加时髦，但也比较不方便，离商业区，剧院，餐厅比较远。佣人的房间都比大学学生的房间好，她写道。

美龄的母亲不喜欢住得离她的慈善机构那么远，提议搬回他们上海虹口区的老房子里去，美龄出生前他们就住在那里。由于那里越来越繁华，房价是上海最高的，所以美龄提议卖掉它。她写信给她的朋友说，她的母亲“很震惊，为我对老房子的冷酷态度感到痛心。”

美龄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家里人考虑买一套拥有所有现代化设施的新房子，一套查理·宋认为会升值房子。“一套虹口的房子，一套霞飞路的，还有……（一套新的）……我们有很好的土地保障了。”美龄写信给朋友，“更别提我们在外滩的地了，很值钱的。”提到交通工具：“我们有一辆很可爱的马车，两个马车夫，但是马太麻烦了。不能长时间使用。下星期我们准备去弄一辆汽车，可以在镇上各处跑，把马车留给母亲用。”

宋家最后决定不搬，美龄和子文得到了四楼的四间房间。“我们……很享受我们的自由，”她写信给爱玛，补充说，由于子文白天总是出去工作，所以她就一个人享受所有的房间。“楼上有一个佣人，专门负责整理这些房间，并且听候我的差遣……我辞掉了我的女佣。我发现我用不到她，因为母亲的女佣会为我做针线活，帮我收拾衣服，让我恼火的是，跟女佣解释我要做什么的时间，足够我自己执行自己的命令了。你看，在民主美国的这些年对我产生影响了。我很满意现在这个为我和哥哥服务的佣人。他给我们擦鞋，掸灰，扫地，铺床，等等，比我的女佣好得多了，我那个女佣以前总是跟他吵架。”

掌管家务的同时，美龄还接管了照料她两个弟弟的责任，两个人前一年都没有通过学校的考试。她写道，家里人“很愤怒。这两个可怜的小孩有两个家

教（一个教英文，一个教中文），每天都来……两个小孩考试不及格的事情加重了我的‘杜兰学者’头衔^[1]在家人眼中的份量。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奇迹……我彻底控制了两个男孩，因为母亲觉得很厌烦，就把他们完全交给我了。他们很难管，因为他们非常聪明，同时又很懒惰。我打了那个小的好几次，他们都很怕我。你不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多好的纪律实施者！”

美龄在美国喜欢的东西包括奶昔和冰淇淋汽水，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有127到130磅重。她的母亲立刻让她节食，并一直坚持到体重下跌至100磅，就是这个体重，她一直保持到了老年。

一件更难调整的事情就是学着成为她的家庭和她的祖国的一部分。“你的两封信刚到！”她写信给爱玛。“对于一个迷失在沙漠的陌生人来说它们就像是绿洲！不要认为我对我的家庭生活不开心或者不满意。远远不止那样。只是……我甚至不确定我到底在哪里。你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融入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我是个非常独立的灵魂，十年来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因此，让我记得要顾虑旁人，很难。我也很担心我不是那么有耐心。”

她的不耐烦也可以归咎于那个叫H.K.的年轻人，他频繁回上海。“他总是来这里，”她8月中旬写信给爱玛。“我害怕，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在乎他……当然和他像以前一样相处。”两个月后，



▲ 倪珪贞

H.K. 请美龄吃晚饭，席间他的一个朋友也向美龄表白了。

她很愤怒，因为H.K. 公然告诉他的情敌美龄已经跟他订婚了：“他总是表现得好像我属于他一样……而且……我没有机会否认。”她还宣称对于男人的态度是“很无所谓”的。“在晚宴上，我遇到的大多是杰出的已婚男人，”她写信给爱玛。“……母亲和父亲反对我与男人有过多接触，因为未来的三年内他们不希望我结婚。至于我自己，呆在家里我觉得很满意，我也不想结婚，——尤其是我告诉过你，我在船上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既然不能嫁给我真正喜欢的人，我就只嫁给名誉和金钱。我知道你认为我唯利是图，但是不管怎样，大大，亲爱的，现在所有男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厌

世，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见他不正是我的幸运吗！家人因为他是外国人就那样嘲讽他，让你觉得他是个野蛮人！”

渴望找工作——有些能让她“忙和感兴趣”的事情——美龄向爱玛抱怨她既没有为她的家庭福利做贡献，也没能提升自己的才能。她不被允许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出门。“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愤恨。我只是被动的接受着。你不能相信一个烈性子的人会这样表现，对吗？……我只是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迟钝。”

10月10日，美龄和哥哥让他们的母亲放佣人们一天假，全家人一起去了全城最大的集市，她写信给爱玛，“我们居然真的在那些小摊上买了蔬菜等东西。我们甚至说服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去，我们都穿上了最最破旧的衣服。你可以想象我那高贵的母亲在整个过程中有多不自在。”上海的集市，“巨大的帐篷式的结构，占地5英亩左右，”水泥地板，黑砖顶，农民们租用摊位。回到家，全家人聚集在厨房里，做他们爱吃的食物。美龄做了浓巧克力，她只会做这个。午饭后，孩子们想去赛马，但是，“由于父亲和母亲被看成是教堂的‘顶梁柱’，”他们一起搭车去教堂转了一圈。“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佣人们已经准备好晚餐了，大家都吃得很快活。晚餐后，我们发现几个忘恩负义的无耻的佣人又偷偷溜去戏院了。父亲怒火万丈；他命令锁上所有房门。这样这些可怜的无赖就只

能在外面的马厩里过夜了！我想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偷跑出去了！”

像世界上所有有钱人家的小姐一样，美龄大学毕业回到家，就投入了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中。不过她看起来是在寻找各种机会证明她不受传统的束缚。作为富裕阶层的一个非典型年轻成员，她总是喜欢用她美国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引起上海社会的轰动。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主日学校教书——对她那样一个女孩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她是唯一一个教男学生的女教师，她最喜欢的学生喊她为“先生”。她的下一个工作更有意思，1917年10月她写信给另外一个朋友，“我在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自娱自乐……我可以免费看电影。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对爱玛，她很诚实地评价自己承担这份工作的资质：“试想让一个年轻的，单纯的，初出茅庐的人……来审查什么样的电影是对民众有意义的。呸！”像许多其他人一样，美龄志愿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那她发起中国妇女组织。但是很显然她并不满意。“我想我很希望自己在做些实际的事情：某项事业，”在家呆了四个月后她写信给爱玛。“我现在的生活会以结婚收场……即使是在大学里，我只在必须或者我认为必须做的时候才做，这一点我现在也没有改变。如果有一份职业，我就可以强迫自己去工作，努力工作……现在我能感觉到我那两个已婚

的姐姐为了我凑在一起结成‘重要联盟’……但是我承认她们的逻辑无可厚非。她们说，‘现在到了你做出这段时间最大决定的时候了。’……我耳边充斥着结婚这个词，从早上到中午，直至晚上。”

也就在这时候，美龄的脸上开始发东西了——可能是她幼时受到神经性疾病侵害的新症状，还有折磨了她一生的神经性皮炎。尽管她认为是痤疮，但其实一定是别的什么，因为她谈到治疗时剧烈的疼痛。遵照她母亲的意思，她不再出门，除了晚上，戴着纱巾。可是很快，她决定“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她的生活……我发现我呆在家里的时间越长，脾气就变得越难以控制。”她写信告诉爱玛。

她也开始考虑政治和国家，她跟朋友说有“太多的苦难……到处都是！有时候看着我们破旧不堪，挤满了人的贫民窟，我感到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希望是那么的渺茫，同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大大，你不会明白在这种环境下人会觉得自己有多无能；穷人在这里所占的比例比美国大得多，超乎你的想象。”《北京公报》被镇压，政府倒台后，她写道，“中国的政治是无理的，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没人知道接下来谁的脑袋会被砍掉。”

上海市政府请她加入童工委员会，以前没有中国人加入过。对一个在美国上流社会生活了10年的女孩来说，调查上海工厂工作条件的经历是惊心动魄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期，据这个城市的一位年代记编者说，这些工厂里的条件是这样的，“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糟糕。”承包商在郊区寻找旱地或者洪水地，在村子里买到女孩子，把她们安置在由廉租房改建的工厂里，让她们每天持续在机器前工作14个小时，1个星期7天。只有一次假期，中国农历新年，据说是这样。

“我……花了很多时间参观上海的工厂，那些所谓的国际（大多数是英国人开的）工厂让女人和孩子们超时工作，而且工作条件很糟糕，对此我非常反感，”很多年后美龄说。“卫生状况令人觉得恐惧，婴儿们躺在走廊上，他们的母亲在机器前工作。”

这些不幸的女人干活的“工厂”里几乎没有光线，空气混浊。很少有窗户。女人和6岁大的小孩都在里面，据一个作者说，“受到转包商的管束。”一年工作364天，他给她们“廉价的食物，劣质的衣服，庇护所很拥挤。这些服务都要收费，在她们离开前必须用劳动来偿还完。”对每个工人来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个梦想，因为那样就可以在工作时间坐下来。经过多年非人的工作条件的折磨，加上缺乏营养，工人们常常会生病，然后被解雇。肺结核的发病率很高。

情况最糟的地方包括丝绸厂，或缫丝厂。“在丝绸厂里，”美龄报道说，“女人们的手是紫红色的，因为必须

用敞口容器里滚烫的蒸汽干活，她们的手常被烫出水疱来。”由于最微弱的气流都会扰乱丝线，所以即使堆满死蚕的地板散发出了腐烂的气味，也不可以采取通风措施，这些工厂发出的气味是难以忍受的。女人们转丝，而孩子们则被雇佣来搅动沸水里的蚕，把线变松。孩子们的眼睛都是通红的，据一个参观者说，他们的手臂上布满了一块块烫伤。“女人和孩子们逐渐掌握不让整个手沾水的技巧，可是他们的皮肤还是松弛，被烫，因为手指还是不可避免地不断接触到滚烫的水，”另一个参观者说。“同时，中国的女监工们在厂房里来回巡视，时不时惩罚一个她们认为效率低或者偷懒的小孩，把他们的小手攥进烧得滚烫的锅炉水里。”

工厂是廉价建造的，所以时常发生火灾。在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大火吞没了一个缫丝厂，100个妇女在火海中丧生，因为厂主把她们反锁在里面。像他的同类一样，这个男人把他的女雇员当成囚犯一样关起来。即使不把她们锁起来，那狭窄难走的楼梯，堆满了杂物和垃圾，也使得这个工厂变成一个火灾易发地。

8

希望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还有美龄的新晋姐夫，孙逸仙，他1916年4月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次回

家并不舒服。“我们化了装呆在上海，住在一个法国新闻记者^[2]家的阁楼上，”庆龄说。“我们白天从不出门，只有晚上才出去，而且，是在精心化装之后。”在这段政坛混乱的时间里，孙仍坚持不懈地寻求支持。“他非常小心谨慎地跟那些能帮助他的人谈话，”庆龄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编辑书籍，以免使他的追随者们分裂。‘我们必须小心行事，’他总是告诫我，‘采用中国式的方法——迂回法——切不可直奔目标。’”

孙宋1916年夏天搬去了广东，以建立孙在中国南方的政府。尽管国外势力都不承认这个新政府，但是这对新婚夫妇的出现确实引起了震荡。据一个摄影师说，庆龄是第一个跟随丈夫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中国女人，也是唯一一个出席政治集会的妇女。受制于天性，她现在



▲ 孙中山、宋庆龄在莫利哀路寓所前

必须学着跟她不认识的人相处。“你知道我有多怕成为焦点，”她写信给一个美国朋友。“但因为我的婚姻，我必须出席很多场合，不然的话我早就逃跑了。”

庆龄在聚光灯下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她丈夫的职位，先是大元帅，后来是中国南方政府的总统，都很短暂。1918年4月，孙被政府高层里更有野心的人降职，成了一个八人委员会的成员。5月份他离开广东去日本，再次筹集资金。但是日本人甚至都不允许他进入东京。5月底，孙和庆龄回到了他们位于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的家中。

他们灰色的砖房，是个让心灵休憩的地方，是海外华人集资购买的，有一个隐蔽的阳台，面对着一个可爱的花园，花园里有巨大的假山，还有一个两层鸽棚。在这里孙可以潜心写文章，并且把他早期的文章编纂成书，庆龄帮助他。显然，作为一个阅读者和思考者的家，这里装潢简单，最显眼的就是靠着墙壁摆放的一个个木书橱了，不仅孙的书房里有，大厅里也有。据说一共有五千多册，



▲ 莫利哀路寓所内景

有很多是关于历史的——从门罗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写的有关一战的书，什么都有。优雅又简朴的家，住着它的主人——他们抵押过房子好几次——作为和平的让步。据孙的卫士说，“孙夫人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她从来不在他工作的时候打扰，但她也是唯一一个能让他不管发生什么都保持乐观和高兴、继续生活下去的人。”

10

从心理上来说宋家的人都是美国人。

——乔治·E·索科尔斯基

她未来的丈夫在政坛努力往上爬的时候，美龄在过着轻松而没有目标的生活。这个任性又骄纵的宋家最小的女儿有时候会和其他有钱女人一起打一下午麻将，却不愿意去认真钻研传统礼仪。她总是第一个厌倦的人，而且不会根据大家的输赢情况，等个合适的机会离开，而是直接跳起来就走。晚上活动的时候她也这样。“宋小姐总是很严肃，即使是在没有烦恼的日子里，”一个年轻的社交聚会常客说，“我记得她从来不加入我们这群彻夜大笑大闹的蠢人。我对她那响亮而美丽的嗓音印象很深，还有她那双比例完美的脚。”

如同很多要寻找自我的年轻女人一样，美龄从她的外表着手。就像她在美国的时候着装越来越中国化一样，现在她不再常穿西式衣服。不过，她还是引起了一些评论，她会穿收腰的裙子（中国

女人总是穿直筒裙），戴各种款式的帽子（中国女人从来不戴），穿骑马用的马裤，还有网球服。

回到了中国，美龄意识到她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不熟悉，为了弥补这几年一直生活在海外造成的缺憾，她请了一个老学究来填补自己中式教育上的欠缺。她跟着他学了几年，学着背诵中国的古诗词，按照传统的方式一边吟诵一边前后晃动身体。同时，她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一战结束后这里的生活对于有钱人来说是很快活的。就像一个美国人所述，“她19岁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过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商业很繁荣。每个拥有汽车和司机的人，参加持续数天而不是数小时的奢华派对，总有著名电影明星的精彩表演。“马路上都是饥饿的，愤怒的、快被饿死的人，有钱中国人的豪华轿车在他们中间开来开去，他们在玩乐、食物、衣服上一掷千金，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赛珍珠愤怒的写道。而美龄不关心别人，她还是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开朗活泼，是中外聚会受欢迎的常客。当然她也很聪明地控制自己抛头露面的频率，这样就不像是急着要找个丈夫。她一边忙于学习中文和为慈善事业工作，一边又去江湾国际赛马俱乐部赛马，还帮助筹划各种时髦表演。

有一种传言说，回到家以后，美龄要求父亲在西摩路买一幢公馆来替代霞飞路的老房子。“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国外，”查理笑着跟一个朋友说。“他

们回来后会很不知足。‘父亲，我们干嘛不能有个更大的房子？父亲，我们干嘛不弄个现代化浴室？’接受我的建议；把你的孩子留在家里！”查理是真的不同意她女儿的要求，还是要炫耀他有给他的孩子想要的一切的能力，不得而知。事实是，美龄搬进了她想要的房子里——1918年她父亲死后。

查理，患了癌症，最后死于癌症，他很幸运地有机会再次看到并且招待他的恩人，朱利安·卡尔将军，将军在身体很好的时候来拜访他了。1917年，美国贸易委员会派卡尔到东方来寻找商业机会，1917年3月他在上海停留了5天。这段时间，查理陪他四处观光，与教育家和传教士会面。3月31日，美龄的父亲给卡尔举办了一个“很多人参加的盛大欢迎宴会，”一周后这个参观者要离开的时候，三个巨大的瓷花瓶被精心包裹好，放在船上——这是查理送的礼物，以对“所有的好意表示感激。”

一年后的3月中旬，美龄写信给爱玛说她父亲“变得非常消瘦，医生让我们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尽管她承认面对查理越来越暴躁的脾气，她很难表现得“神采奕奕”，并且控制住她的“火爆性子”，美龄还是每晚用橄榄油给他按摩。家人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一星期后，当医生告诉宋夫人她丈夫康复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时候，她又把他接回家了。“母亲说她不相信医生，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上帝。所以她拒绝让他



▲ 宋耀如

出汗排毒，”美龄写信给爱玛·米尔斯。“……由于精神压力，加上母亲拒绝遵循医生的指示，我快要发疯了。在医院里，他被要求喝水；在家里，他滴水不进。家里有两个3岁以下的小孩，不可能保持安静……医生说病毒已经侵入父亲的脑子了。他总是睡着，脸也肿了。

1918年5月3日查理·宋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他身边。有一个作家暗示是谋杀，他提到，查理的近亲属们没有一个向他的朋友提起过他的病，葬礼上连按照惯例应该有的悼词都没有，那致命的癌症可能只是某个邪恶阴谋的“华丽的掩饰”。这看起来只是那些不喜欢宋家的人的无聊指控。查理就像很多他的同胞一样，在谈到一

些他认为知晓范围得控制在家庭成员内的事情时，一贯保持缄默（这个家族到今天都维持着这个传统），当然，他健康状况的恶化也属于这个范畴。

父亲病重期间，美龄被流行性感冒击倒了。“我躺在床上觉得身在寒冬季节，下床却发现明媚的春天已经到了，”三个星期后她写信给爱玛，“纤弱精致的苹果树开花了，樱桃树也开花了，柔美的柳树发芽了，丝绸一样的木兰吐新芽了，水仙花也垂下了头。”她为信写得萎靡不振请求朋友的原谅，她说她觉得“太虚弱以至于发脾气的力气都没有——这个事实没有瞒得过我那眼神犀利的女佣。”

查理死后，美龄的母亲搬到他们另外一所房子里住了段时间，盛夏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出了趟门。美龄和子文，两个热衷于搞派对的人，留在霞飞路的家里。“我们当然玩的很开心，”她写信给爱玛，“举办晚宴，牌局。然后半夜出去兜风……我们的表亲们过来了，所以经常在家举办派对。我担心佣人们不像我们一样开心，因为我们一直差遣他们做这做那。譬如有一次，一天之内我们让他们做了三次冰淇淋。另外，白天雨一会下一会停，他们得把打网球的网和线搬进搬出。”果不其然，两个星期后美龄自己“跟厨子吵起来了——我们10天里换了6个厨子！”尽管如此，她还挤出时间为“美国的女子大学”写了篇文章，文章被《上海公报》引用了。



▲ 西摩路宋宅外景

这次成功使她想就上海需要进行的社会改革写些文章。“我多希望你在这里帮我整理出一些我没考虑到的重点，”她写信给爱玛。“……我个人在以麦考利为笔名进行一项课题研究。我想掌握些分析性文章的韵律和节奏。”

既是社交界头号美人又是未来的改革家的美龄，和母亲兄弟们一起搬进了她在查理去世前就看中的房子里。结实的大铁门和厚竹墙仍彰显着这个家庭的财富，路人经过时可以瞥见这幢绿顶的黄色大房子，还有种着一棵巨大的木兰树的美丽花园。美龄这个新家的外形像是栋欧洲乡村式建筑，有很多阳台和门廊，最值得一提的是配有一个可以容纳两辆车的车库，据一个观察者说，“真的是富人的房子。”

“内部是用柚木装饰的，雕花木门，双层底板，还有铺了瓷砖的暖房和厨房！”搬家前美龄写信给爱玛。

楼下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厅，一个盥洗室，一个吸烟室，一个雕花吊顶的大餐厅，管家的储藏室和厨房。二楼有三

个房间，一个大的起居室，一个正方形的大厅，还有一个漂亮又宽敞的浴室。有两个放衣服的壁橱——在上海壁橱是很少见的。三楼是一个屋顶花园，我们在这里度过下午的时光……房子边上的暖房里，我和花匠准备为花展种植一些玫瑰。我们想把车库造成三层楼高，第二层做佣人房，第三层做储藏室……

霞飞路的房子对我们来说太大了，……我们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思念父亲……它看上去宽敞又讲究，可是不温暖“没有家的感觉”。两个姐姐不在，她们的佣人和孩子也走了，就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这个大房子里，觉得很失落……在另外那个房子里，有一个厨子，一个男佣，一个小工，一个司机，一个花匠，还有我母亲和我的两个保姆，我们觉得这样很好。父亲去世前把所有事务都处理好了，而且我母亲了解他所有的生意，所以我们并没有麻烦。外面的人猜测父亲到底是个百万富翁还是只是个中产阶级，这实在是可笑。过去的七年里，父亲总是一个“悠闲的绅士，”除了家里人没有人知道他怎么积累财富……对我们来说他是个多好的父亲啊！即使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爱他。



[1] 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一项学术奖，宋美龄在校期间获得过这项奖励。

[2] 当时孙中山偕宋庆龄居住在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西路）55号，法文日报《中国回声》的编辑 Wai Yuk 处。

■ “5·18 国际博物馆日” 宋故居接待人数再创新高

2012年5月18日是第36个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上海宋庆龄故居接待游客2818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3.7%，创下了近年来宋故居日接待人数的最高记录。

■ 美洲、大洋洲地区侨界妇女访华团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012年6月12日，应国务院侨办邀请，美洲和大洋洲地区侨界妇女访华团一行60余人，在国侨办国外司美大处处长陈泽涛、市侨办国外处调研员张霞云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美大地区侨界妇女访华团成员大多是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有影响、有造诣的侨界杰出妇女代表。

■ “宋庆龄藏木刻版画展开幕式暨馆藏《宋庆龄书信选编》首发式”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行



2012年5月29日，“宋庆龄藏木刻版画展开幕式暨馆藏《宋庆龄

书信选编》首发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行。馆长金晓春介绍了“宋庆龄藏木刻版画展”和馆藏《宋庆龄书信选编》内容与编辑情况，市府机管局局长薛晓峰在仪式上致辞。

“宋庆龄藏木刻版画展”共展出了61幅新兴木刻版画作品以及相关史料，从侧面证明了宋庆龄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积极支持和帮助。

《宋庆龄书信选编》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宋庆龄1927年至1981年期间所写的中、英文书信和电报294封，其中有部分书信是首次公开发表。

■ 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012年6月6日，美国著名高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鲁思·A·诺克斯女士与副校长史蒂夫·法尔先生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那些由宋庆龄精心保存着的大学时期的笔记、毕业文凭、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影集、校徽等物品，令同样毕业于该校的诺克斯校长倍感亲切。在看到主楼餐厅内摆放着宋庆龄母校1943年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赠送的纪念银盘时，诺克斯校长不禁潸然落泪。她在留言本上写道：“感谢你们给与我的这次美好的参观体验，这里的展览展示了我校毕业生的一生，我被深深地打动并感到无比的荣耀。”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赴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举办“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



2012年8月28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委宣传部主

办，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共同承办的“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56件文物和200余张图片资料。

■美国驻沪总领事一行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012年8月30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葛瑞风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工作人员一行10人，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总领事一行先后参观了宋庆龄文物馆、故居主楼以及花园等处。参观中，总领事等仔细观看了陈列文物，并多次对展陈文物的背景以及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进行询问，讲解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整个参观过程中，总领事一行对宋庆龄的生平、宋氏三姐妹之间的关系等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在台湾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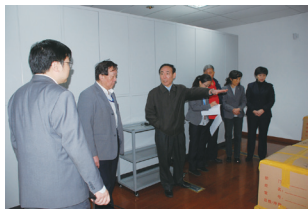
为进一步扩大沪台两地文化交流，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主办



的“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于9月4日至11日在台北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隆重展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金晓春、台北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馆长王福林、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邹镭等领导出席了开幕仪式。该展览共展出50多幅宋故居征集的书画精品，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搬迁工作正式开始

2012年11月6日上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搬迁工作



正式拉开了序幕，首批38箱馆藏瓷器、书信文稿等珍贵文物顺利从档案馆搬至宋陵园新库房。市孙宋文管委副主任秦量、办公室副主任邹镭亲临现场指挥。

搬迁前，馆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文物搬迁工作小组，研究细化搬迁步骤和方法，召开了文物搬迁动员会。搬运过程中，大家严格执行操作程序，保证了首批文物搬迁的绝对安全和圆满完成。

主 编 金晓春 董 卫
副主编 陆柳莺
策 划 麦灵芝
执 行 王宁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